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人与自然的系列

—征服三极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翻开大自然的书页

当你翻开这套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翻开的是大自然的一页页，是人类征服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段段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

《地球母亲》《寻找新大陆》《征服三极》《探险者的凯歌》《探访太空》《风雨可测》《未来家园》《揭开大自然的面纱》《自然美景不胜收》《绿色世界》《动物乐园》《向生物学习》《恐龙的足迹》《征服疾病的道路》《生物工程的光芒》《灾害与人类生存》《人类的食粮》《人体的奥秘》《自然与人类文明》《自然利用与开发》。你可以在这里尽情地遨游，得到知识的营养和生活的力量。

其实，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然的怀抱里，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疑惑：我们从哪里来，谁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和自然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和动物、植物等一切自然的一分子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将来会怎样，我们会到哪里去……

你的心中是否已逐渐有了答案，比如知道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自然的精华。莎士比亚说过：“人类是大自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又比如知道人类虽然是大自然的精华，但也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万事万物的一种，大自然养育了人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要理解自然，就像理解自己的母亲。

在自然漫长的生命中，人类的文明不过是转逝的一瞬，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在不断地改变。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爱护自然、保护自然，才能更好地去利用自然，才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愉快地生活、正常地生息繁衍；和自然界的朋友们友好相处，使自然界是一个和平温暖的家，人类也才无愧于大自然精华的称号。

认识自然，人类经历了许多挫折，有过无数次坎坷；改造自然，人类将付出更多的努力。

编　者

1997 年 4 月

征 服 三 极

征服南极

欧洲人迈出了第一步

根据托勒密的地理学理论，在地球的南方，有一块未被发现的大陆。这块南大陆被当时的人们假设命名为“澳斯特拉利斯地”。为了寻找这个梦一样的地方，欧洲人首先迈出了步伐。

1578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派遣弗朗西斯·德雷克去寻找南方大陆。德雷克原是海盗，他勇敢、慓悍，是个无所畏惧的人物。1 月 12 日，他指挥他的船队——“金鹿”号、“玛利方特”号、“伊丽莎白”号驶离了普利茅斯港。一个月后，他们便来到了麦哲伦海峡。

由于遇到强风，海面掀起的大山般的巨浪使“金鹿”号失去了方向。但“金鹿”号并未沉没，这一叶孤舟一直在大浪里挣扎，被狂风吹向南方。到 10 月 28 日，暴风雨骤然停息之后，船上的人发觉“金鹿”号已漂近一群稀稀落落的岛屿，而在岛屿的南方则伸展着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

面对着辽阔的大海，德雷克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发现。因为自麦哲伦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海峡南面的火地岛是延伸到南方大陆的一部分。而目前的事实表明，它只不过是一群岛屿而已。这些岛屿是南部美洲的最南端，再往南并无陆地，只有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水在此汇合。

德雷克登上海岸扑倒在土地上，亲吻着岩石，然后对部下说：“我们已来到了世界上已知陆地的最南端，并且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走得更南。”

接着他下令“金鹿”号向北航行。他想寻找美洲北端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会合点。但 3 个星期后，极度的寒冷和浓密的大雾严重阻碍着他们，而且海岸似乎不断向西北延伸，好像一直通往亚洲。当他看到从北涌来的浮冰之后，他才让“金鹿”号掉头往南，在气候宜人的海岸边休整。这时，他的头脑里又闪现出环球航行的想法，就毫不犹豫地驾船向西驶去……经菲律宾，穿马六甲海峡，渡印度洋，绕好望角，过佛得角群岛。1580 年 9 月 26 日，他们终于回到了出发时的港口——普利茅斯。这样，他们在海上度过了 34 个月。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为表彰德雷克的功绩，赐予他一把镀金的宝剑，并破格封海盗出身的他为爵士。而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发现，把南美南端与南极半岛之间的通道称为“德雷克”海峡。

然而南极是否存在着一片大陆，依旧是个惑人的梦。而在 100 年后，英国人詹姆斯·库克却成了人类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南极探险家。

库克船长的贡献

1768 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莫尔顿市一个贫寒之家的库克，凭藉自己的勤奋好学、刻苦耐劳，此时已成为一名船长。他这时才 30 岁，被皇家科学院委派寻找南方新大陆。

他把一艘 370 吨的独桅运煤船改装成探险船，命名为“奋斗”号。该年的 8 月 25 日，“奋斗”号离开普利茅斯港，向南航行。南太平洋的秋天，气候非常恶劣，“奋斗”号经常处于狂风巨浪之中。到达南纬 40°时，眼前仍是茫茫大海，没有一点陆地的影子，库克就决定转舵向西，到达新西兰的东海岸。100 多年前，塔斯曼已经到过这里，但他错误地以为这是南大陆的北部海角。库克为了弄清真实情况，就沿东海岸北上，最终证实新西兰并非是大陆，而是毗邻的两个大海岛。

1770 年 11 月，“奋斗”号抵达巴塔维亚，但蔓延着的痢疾和疟疾，夺去了“奋斗”号 1/3 船员，于是库克下令返回英国。

次年，英国政府再次委派库克到南纬 40°以南的地区进行考察。破损不堪的“奋斗”号早已不能担此重任了。皇家科学院又拨给库克两艘独桅船，一艘名为“果敢”号，由库克指挥；另一艘“冒险”号由托拜厄斯·弗尔诺指挥。他们于 1772 年 7 月 13 日启锚直驶南大洋。

船过好望角，越往南行驶天气越寒冷。冰雪不停地迎面刮来，令人难以招架，但库克仍然下令前进。1773 年 1 月中旬，船队进入南极圈，这是人类首次闯入这个陌生的禁区。接着，巨大的冰山阻碍了他们的行程。他们被迫让船往北开，在克罗泽岛和克尔格伦岛稍事休整后，便向东准备到澳大利亚东海岸，但海上的大风和浓雾使“果敢”号和“冒险”号失去了联系。直到 5 月份，他们才在新西兰西部的海域重新聚合。这时，库克通过实地航行，已证明南半球南纬 40°以南的 1/3 水域中没有大陆存在的可能。

船队在新西兰休整后，便继续航行，但风暴很快又打散了“果敢”号和“冒险”号。库克虽经多方寻找，但始终白费精力，只得孤舟继续探险。“果敢”号再一次进入高纬度海域，进行“之”字形绕纬度线一周航行，先后两次进入南极圈，最远到达南纬 71°10′。这时，厚实的坚冰挡住了他们的航道——库克根本没意识到，他朝思暮想的南极大陆海岸离他只有 240 公里。恶劣的气候使他灰心丧气了。1775 年 3 月 21 日，他回到好望角时，在报告中写道：“现在，我已经完成了高纬度的环南大洋之行，在我们所到的地方是没有大陆存在的。这次航行所有的目的都已圆满地达到了，对南半球已经作了充分的考察。自古以来的地理学家和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航海家寻找南大陆的梦想接近结束了。在我之后，没有人会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如果真的有人能做到，我也不会嫉妒和羡慕他所获得的声誉。我敢说，世界不会因为那一发现而获得任何好处。”他还感慨：人常常为自己的梦幻所困惑，而南大陆的梦是最诱人的，所以破灭之后也是最痛苦的。

库克是世界上第一个既到过南极圈，又到过北极圈的探险家。后来，他在夏威夷与那里的波利尼西亚人发生械斗，一个伟大的南极大陆的寻梦者就在那场械斗中死于非命。

英雄时代的第一次

19 世纪 40 年代，探险家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北极和神秘的非洲内地，对南极的兴趣减少了。在 1842～1892 年间，除了英国科学考察船“挑战者”号到过南极圈，南极区一直是猎鲸者和捕杀海豹者的天下。不过，有远见的科学家和海军军官并没有忘记南极，他们呼吁给予这块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地方更多的重视。这呼吁在 1881～1882 年的“第一个国际地球极地年”后更强烈了。

到 19 世纪末期，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工业革命，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社会变革，教育的普及开阔了公众的眼界，报刊和杂志的发行沟通了人们的思想。所有这些因素反之又刺激了人们对自然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南极逐渐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1895 年，伦敦第六次国际地理学会议郑重提请世界各国政府注意：自 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 25 年时间，是“南极考察的英雄时代”。这个会议吹响了人类向南极进军的号角。

把这个时代冠以“英雄”的前缀是出于古希腊人的习俗，他们把一种半人半神的生灵，称之为“英雄”，他们具有普通人类不可比拟的力量和刚毅，并且在磨难面前显示出人类远不可及的耐久力和崇高精神。

英雄时代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探险活动是由比利时海军筹划的。它得到布鲁塞尔地理协会、比利时政府和某些个人的资助。队员来自 5 个国家，船上的大副阿蒙森那时还是无名之辈，而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却充当了这个英雄时代的主角之一。1898 年，这支探险队沿南极半岛作了大量的实地测量和科学调查。到了 8 月 3 日，那艘“别列什卡”号突然被冰封冻在别林斯高晋海。直到第二年 2 月 14 日才从冰层中挣脱出来。这些经受极端困苦寒冷折磨的人，度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漫漫暗夜。当地平线露出阳光时，都惊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才恍然大悟，泪流满面地欢呼起来。

但他们不是第一批在南极越冬的人。自从侨居英国的挪威人波昔葛利芬乘捕鲸船“南十字星座”号归国之后，“南极越冬第一人”的荣誉使他尝到了万人瞩目的滋味，这滋味是双手沾满鲸血的普通船员从未体会过的。于是他毅然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决定当一名南极探险家。他四处奔走，八方呼喊，但热心的资助者却寥若晨星。后来，当他心灰意冷准备重操捕鲸的旧业时，突然来了个叫乔治·纽恩斯的人。那人是个出版家，腰缠万贯，他曾对北极有浓厚的兴趣，现在潮流变了，他的目光自然也跟随着移向南方。他愿意赞助波昔葛利芬的计划，条件是他应获得探险过程中所有的照片刊印权。波昔葛利芬此时有些绝路逢生的感觉，他立即就允诺了。

波昔葛利芬匆匆改造了他的那艘“南十字星座”号，匆匆踏上了征程，他于 1899 年 2 月 17 日在罗斯海西北的阿德尔角登陆。这时已近夏末了，但他和他的探险队站在岬角上，惊讶地看到，躲在浮冰带后面的罗斯海平静得像一个既温柔又冷清的大湖。“南十字星座”号为了避免被冰冻住，留下了波昔葛利芬和他的探险队，就急急地向北开走了。

他们在阿德尔角按照计划过冬，但他们发现，要爬上浅滩四周的悬崖峭壁是痴心妄想，所以到内陆探险的打算也就成了泡影。为了对纽恩斯有所交待，波昔葛利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沿着已经结冰的罗斯海海岸作了些科学考察，收集了大量动物、植物和岩石标本，记录了气象的变化并进行了地磁测

量。

这是人类第一次有计划地在南极大陆进行冬季考察。人类第一次在南极大陆发现昆虫，第一次在南极大陆使用狗拉雪橇，第一次……非常遗憾，也是第一次在南极大陆举行葬礼——1899 年 10 月 15 日，探险队的挪威籍动物学家哈森患内疾死去。波昔葛利芬把他葬在一个 300 多米高的冰崖之下，并在那里竖起了南极大陆第一个十字架。

斯科特与阿蒙森

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南极探险计划。该计划要求英国、德国和瑞士组织 3 支探险队，相互配合，分工协作，沿不同的路线对南极大陆的几个地区进行综合性的实地考察，从而争取对该大陆的探测工作有突破性的进展。

皇家地理协会会长克莱门特·马卡姆爵士为英国没有合适的探险队队长而焦虑。

1899 年春天的一天，爵士在路上偶然遇到了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并认定他是探险队队长最好的人选。31 岁的斯科特确是个能力非凡的人，他挑选的探险队员也十分干练。在短短的一年当中，新船下水并把设备安装完毕；生活的必需品采购齐备、编号包装；数吨重的仪器亦已集中上船。在斯科特的“发现”号于 1901 年 8 月起航时，没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被遗忘。

几年后斯科特回到英国，凯旋使他名利双收。他立即被提升为海军上校，并由国王授勋，但没有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爵位，原因也许是由于他的失误，使“发现”号封冻在南极两年之久。

斯科特又回到了海军，指挥着一艘战舰。他没想到，他的一位南行的同伴，决计重返南极，开始新的征程。那位同伴就是被斯科特提前遣送回国的沙克尔顿。

沙克尔顿所得到的荣誉是理所当然、受之无愧的。他的探险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有成就。由于矮种马的运输，他发现了罗斯海——罗斯冰架的南海岸，并证明南极不是个被冰封住的群岛，而确确凿凿是块大陆；他已打通了去南极点的大半段道路，登上了世界少有的高原，而这高原在地球的底部；他攀登了艾尔帕斯火山，绘制了维多利亚地的南海岸地图；他到了南磁极，采回了极有价值的各种标本……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艘用过 40 年的木质船上的 15 个人做出的，而且这 15 个人在这段艰难困苦的旅程之中，无一死亡。

老部下被授予爵位，使斯科特有种莫名的耻辱感。为了使自己的军阶能更上一个台阶，斯科特决心造就新的业绩。捷径便是新的探险，他想成为到达南极点的第一人。

斯科特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在“英雄时代”中规模最大的南极探险队。

斯科特开始作探险前的准备。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沙克尔顿托人转来的一个请求：希望斯科特能允许他来访。沙克尔顿认为，他的某些在南极的失败教训，会有助于斯科特的成功。但斯科特不愿再见到现在名声已超过他的沙克尔顿，于是借口自己筹备工作太忙而拒绝了。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他本来可以向沙克尔顿学到许多东西的，而他那位慷慨的老部下也许能帮助他免于以后的悲惨结局。

不过斯科特并没有不重视沙克尔顿的经验。他仔细阅读后者的每一篇讲演稿和发表的文章，尤其对他使用矮种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是斯科特仍确信人拉雪橇比其他形式的运输工具拥有绝对的优势。当然人拉雪橇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采用了新发明的履带式拖拉机。

1910 年 6 月 1 月，斯科特的私人探险船“新地”号从英国的加得夫港启程。

10 月 2 日，当斯科特的“新地”号驶进墨尔本的港口时，一位专程来迎

接他的官员递给他一份电报：

“我也要去南极。阿蒙森。”

阿蒙森？哪个阿蒙森？哦，是那个因为开通西北航路而变得不可一世的挪威人？他不是说要去北极吗？斯科特百思莫解，他并没把阿蒙森当作一个竞争者，因为后者还在千里之外。

阿蒙森确实是想到北极去的。自他在 1906 年返回挪威之后，一直在组织一次征服北极点的探险活动。而在他正准备成行之时，突然传来美国的皮尔里已到达北极点的消息。这对阿蒙森真是个晴天霹雳！这意味着他 4 年处心积虑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

阿蒙森痛苦万分，但他不愧为是个精明的人，不动任何声色，依旧在为他的探险奔忙。而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照样地慷慨陈词：“征服北极点曾经是我的愿望，但我更大的目标是为北极科学而献身。”

人们开始将信将疑，直到他把探险队里的科学家送上邮船，让他们在旧金山等候他的“先锋”号时，才疑窦顿消。

1910 年 8 月 9 日，“先锋”号从挪威出发。它先向南航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巴拿马运河还在开凿，他必须绕过南美洲，才能向通往北极的白令海峡前进……“先锋”号按照既定的航线航行。当它到达非洲西北部海域的马德拉群岛时，阿蒙森让船靠岸，去当地邮局给斯科特拍了上面的那份电报。这时，随船的探险队员才恍然大悟，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极点。

至于那些在旧金山空候的科学家怎么想，阿蒙森已顾不上了。此时他的脑子里只想着要第一个登上南极点。

然而他与斯科特鹿死谁手，还是难以意料的事。斯科特毕竟比他早走了两个月，而他自己南征计划也是临时制定，对南极的了解更比斯科特少，自己充其量只在南极的冰海里度过一个冬季，经验有限。

对阿蒙森的电报，斯科特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反应，即使在他给妻子布鲁斯的信中，也没流露出多少怨恨的情绪。他写道：“我不知道如何看待阿蒙森……我已决定就当他不存在一样。任何竞赛的意图，都会毁掉我的计划，除了该计划，别的事似乎都不是我向往的。别担心，以为我会为他而烦恼，其实我很少想到他。”

“新地”号于 11 月 25 日从新西兰离开，这比以前的任何探险队都早。但是后来的经历表明，他的太早动身于事无补，因为那时的浮冰区还是冻结得像铁板一样。船往往要到 12 月中旬才能勉强通过。这样，斯科特必然要在冰区外来回逡巡寻找通道，这样会浪费许多燃料。而且，由于斯科特急于上路，装载的物资堆放得乱七八糟，舱室被塞得密不透风，甲板上也是一塌糊涂：成百吨的煤、煤油、润滑油、罐头、马料和米面堆放在一块；3 辆履带式拖拉机围成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混养着西伯利亚矮种马和爱斯基摩狗。船明显超载，额定的吃水线已远远低于水面。

斯科特的“新地”号没有沉没已算是大幸运了。12 月 2 日凌晨，轮机员报告船底的污水泵堵塞了，水正在漫进轮机室。甲板上的海员立即使用手泵，但手泵也很快被堵塞了。于是，船上的每一个人，包括科学家全都被组织起来，分成两班，不停地用桶把水从轮机室的窗里舀出去。尽管这样，水却进得比他们舀得快。船的两侧和甲板的缝隙全漏水。它越下沉，水漏得越快……船张着帆在南大洋的波涛里摇摇晃晃。因为轮机室里的水涨得很高，锅炉下面的火已经熄灭，情况万分危急。埃文斯海军上尉和鲍尔斯脱光衣服泅进又

热又脏的船底污水中，准备清理堵住水泵吸水管的污物。他们知道，水在他们的上头，甲板上的货物捆扎不稳，只要一个大颠簸，船随时都会沉下去，而他们也就根本别想逃出去。但是他们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拚命地用手挖污物。他们费了 6 个小时才清除出 20 桶沥青状的沉积物，这是煤灰和从甲板上淌下来的机油的混合物。

经过 48 小时的抢救后，船总算保住了。但他们损失了两匹矮种马和一些狗，它们被淹死了。另外，为了减载，他们把 20 吨油料抛进大海。

“新地”号于 12 月 9 日进入浮冰区，费了 3 周时间破冰而进。斯科特只是比他 1902 年早一个星期进入罗斯海，其代价是耗费了可供 16 天用的煤。斯科特原想在圣诞节前赶到“营房基地”附近的那片海域，但一直拖延到 1 月 3 日才实现。船几次想靠岸，可是翻滚的巨浪几乎要把船倾覆，斯科特只好另找登陆点。

第二天，“新地”号终于靠上了罗斯岛的埃文斯角，他们立即上岸架设营地。在这个季节，一天 24 小时都有阳光，所以全体探险队员不停地工作，到了 1911 年 1 月 21 日，一幢具有英国海军海岸建筑风格的基地终于建成了。

与此同时，“新地”号趁着南极夏天的解冻季节，由海军上尉彭内尔指挥，向东行驶。他意气风发，但当船驶到罗斯海东岸的鲸湾时，突然看到了一条非常简陋的船停靠在冰崖旁，原来是阿蒙森的“先锋”号！

这是斯科特探险队最不愿意看到的场面，它显示了阿蒙森征服南极点的不用怀疑的潜力。

这天是 1911 年 2 月 4 日。在这以前，即比斯科特的“新地”号迟一个多月，阿蒙森的“先锋”号才于 1 月 2 日进入南极圈，但他进展神速，1 月 14 日便到达了鲸湾。与斯科特不同，阿蒙森始终是个假日的忠实信徒，他到达鲸湾的第二天便宣布为休假日。即使在最关键的探险途中，星期天也只干些非干不可的零碎活。他们在 1 月 16 日开始卸货，10 天后，一座不大但极其舒适的营房便建成了。阿蒙森把它命名为“先锋者之家”。

“新地”号船长彭内尔不失英国绅士风度，拉响汽笛向“先锋”号致意，“先锋”号也回报以响亮的汽笛。彭内尔登上岸拜访了阿蒙森，同时详尽考察了“先锋者之家”。第二天，阿蒙森回访了“新地”号，在船上与彭内尔共进午餐，谁也没提关于竞争的不愉快的话题，相反互致了许多友好的问候和祝愿。临到分别，阿蒙森对彭内尔说：“请转告斯科特，他会收到我的一封信。”彭内尔当时如坠五里云雾中，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在将近一年之后，斯科特果真收到阿蒙森的一封信，不过那是在南极点上。

告别了阿蒙森，“新地”号立即西返，几天后回到罗斯岛，向斯科特报告了阿蒙森的情况。

斯科特久久不语，最后才呢喃一句：“他来了……”他的脸上浮出一片阴影。

当天他在日记上记着：

“我们必须干下去，就像这事没有发生那样……并且为我们的国家的荣誉竭尽所能，毫不惊慌失措。虽然阿蒙森的出现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他距离南极点比我们要近 96 公里，我也未料到他能把这么多狗弄到冰上，他使用狗似乎非常出色，但我们有矮种马……

斯科特一直认为，矮种马对适应寒冷及艰苦环境的能力与爱斯基摩狗一样强。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在南极地区一切食物都必须靠外面供给，因而

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马不像狗，它们不能吃主人吃的同样食物。而爱斯基摩狗则大不一样了，它们是食肉动物，根本不需要外地运去草料。它们的毛长而且密，在—50℃的风雪严寒天气里，仍可以行走自如，就是被大雪埋住了，只要露出脑袋，依旧能够酣然入睡。

斯科特和阿蒙森征服南极点的竞争，心照不宣地开始了。这个竞争是意志和毅力的交锋，也是经验和智慧的较量。然而，非常奇特的是，从某种意义而言，竞争的胜负成败竟取决于运输工具的优劣。

当“先锋”号在卸最后一批物资的时候，阿蒙森离开“先锋者之家”去设置第一个补给站。他计划直下东经163°线，从南纬80°开始，每一纬度设一个补给站。

阿蒙森带了4个人和3架雪橇，每架雪橇配备6条狗。阿蒙森的探险队员从不拉雪橇，只是在停下来休息后再行走时才用人拉一下，这个人作为狗跟随的目标，一会儿狗就会自寻方向径直飞奔，而人只需在旁滑雪前进就成。如果顺利，人还可以坐在雪橇上休息，让狗拉着行走。

爱斯基摩狗一天走28公里轻而易举。头三天，阿蒙森一走完28公里就立即宿营。第四天，他想试试狗到底能走多远，就让狗不停地拉着雪橇。到40公里，他发现狗开始喘息不已，便下令扎营。

阿蒙森的计划非常缜密，他对午餐也作了独到的安排。他带着一种新设计的保温瓶，在每天启程前进早餐时，便把热饭菜装在保温瓶里。这样午餐可以在任何时间吃，既节约燃料又省下了时间，不像斯科特的探险队为了吃顿午餐，要搭帐篷要生炉火，花费一个半小时才能填饱肚子。

1911年2月14日，他们到达南纬80°，在这里卸下雪橇上的东西，设置了第一个补给站。阿蒙森立即发现了他可能产生的失误：这里离“先锋者之家”距离过长。于是他决定当天便往北返，走了55公里，补设了一个补给站。这一天他们一共完成了73公里的行程，算是一个空前的记录。他在这里休息了一天，接着便往“先锋者之家”走。

在入冬之前，他们一共进行了3次设置补给站的行动。分别在南纬81°、82°设了站。每个站都是按同样的形状建造的：高大的圆锥形雪堆，顶上插一面黑色的三角旗；在它的四周还有十多面同样的旗帜，插成南北向、东西向的两条直线。怕被大风刮走，每面旗帜都标上到中心的距离和方向。

阿蒙森的最后一次行动于4月12日结束，就南极来说，这个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一共死了3条狗，损失微乎其微，但他却已把3吨重的物资存放在去南极极点的几个补给站中，而这些补给站里最远的一个在离“先锋者之家”以南384公里的地方。

阿蒙森现在成竹在胸。他比斯科特在罗斯岛的基地更靠近南极点96公里，并且贮存了大量的海豹肉和企鹅肉。他知道在下一个南极的夏天，斯科特能到达南极点，但他更相信自己能够首先到达南极点。现在所需做的，仅是在南极的漫漫冬天里养精蓄锐。

“先锋者之家”是一个整洁而舒适的营地。在“先锋”号驶回新西兰之后，留下的只有9个人。他们全都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每个人有一张床、一个衣帽柜和一套书架。床上除放自己脱下的鞋袜外，不许放任何东西。地板上铺着地毯，墙上和天花板都被油漆刷得锃亮。他们用煤油汽灯照明，燃油加热器使室温保持在20℃左右，因此行动非常轻便。

他们在房外挖了一条渠道，以排除日常的污水；在渠道的顶端又挖了一

个深坑，使污水能在那里冻结。他们还造了一个浴池，每周可以洗去身上的脏物。

狗房就在营房的旁边，狗群被关在一个深坑中的圆顶帐篷里。坑的周围堆起一堵墙，由于狗尿狗粪的堆积，很快使四周的墙牢不可摧。狗有足够的食物，营养很好，所以在冬季里产了 55 只小狗。

在“ 先锋者之家 ”里没有值班人员。而在斯科特探险队里却要值班，其原因是防止由燃煤引起的火灾。阿蒙森用的燃油加热器比斯科特又棋高一着，开关便当，安全可靠。

包括阿蒙森在内，全体队员都按周轮流整理房屋：打扫、擦洗地板、摆餐具、洗碗……星期六是周末，意味着晚饭后喝一杯加热的酒和吸一支雪茄。至于星期天，则是雷打不动的休息日，厨师只是将就着做饭，其他的人打扑克的打扑克，凿个洞钓鱼的钓鱼，猎海豹的猎海豹，生活真是既丰富又悠闲。

在罗斯海西部的斯科特探险队里，却呈现着一派纷纷嚷嚷、凶端四起的景象。由于建基地，探险队里没有一个是精力饱满的，因为 3 个星期以来，他们每天工作 17 小时，匆匆忙忙吃饭，迷迷糊糊打盹，每个人都被搞得精疲力尽。1 月 25 日，斯科特实施设置补给站计划，刚要动身，主力队员鲍尔斯被一头暴怒的矮种马踢了一脚，顿时脑袋血流如注。他草草包扎一下，就跟随队伍出发了。

1 月 29 日，斯科特到达了罗斯冰架，离基地不过 38 公里，却辗转了 145 公里才到达。这仅是冰架的边缘，他们堆放了一些马吃的饲料，算是第一个补给站，取名为“ 安全营地 ”。但“ 安全营地 ”并不安全，阿特金森博士又被矮种马踩了一脚，第二天感染发炎，斯科特只好把他安置在一顶帐篷里，留给他一些食物，等他们回来时再把他带走。

2 月 2 日，斯科特带领所剩的 11 个人继续往南走。途中被暴风雪阻留了 3 天，到 2 月 12 日方才抵达离埃文斯角基地 86 公里的地方，设置了第二个补给站。这时所带的 8 匹矮种马已经羸弱不堪了。养马专家奥茨上尉建议把快病倒的马杀掉当作狗食，但斯科特拒绝了，命令两个队员把 3 匹最弱的马送回“ 安全营地 ”。矮种马在齐腰深的雪中踉跄返回，他们花了 14 天才回到营地，但只有一匹马活了下来。

斯科特一行现在有 9 个人、5 匹矮种马和两队狗。他们缺少狗食，以致有一队狗饿慌了，向一匹矮种马发动进攻。斯科特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才制止狗，不过那匹矮种马的腿上已被咬得鲜血淋漓。

斯科特原计划把主要的补给站设在南纬 80 ° 的地方，但他发现他不能走得那么远，除非冒损坏运输工具和损失人员的危险。所以他在 2 月 16 日把补给站设在南纬 79 ° 27 ′ 处，比他的目标减少了 67 公里。他把它命名为“ 一吨站 ”，名字取自该处储存品的数量。

这次行动清楚地证明了一件事：狗与马不能同时用作运输工具。它们各自的步调不同，要使它们在路上并驾齐驱，既妨碍了狗又累坏了马。回来的路上，斯科特只好带着狗走到前头，而由奥茨带着马跟在后面。

由于食品不足，他们只得减少一半的定量。不过，他们走得很快。由于慌不择路，斯科特的一队狗落到一道冰隙里，斯科特花了一天时间用绳子把它们从 20 米深处救上来。

他们在 2 月 26 日到了“ 安全营地 ”与阿特金森博士会合。休息了两天后，斯科特让鲍尔斯等 3 人带着 5 匹矮种马先走，绕道以前的“ 营房基地 ”再回

埃文斯角的新基地。但走了才一天，一匹矮种马垮下来死了。他们重新装载雪橇，让 4 匹马拉着前进。当晚，他们在一块很结实的浮冰上宿营，由于精疲力尽，睡得很沉。哪知这块浮冰悄悄漂动，脱离了陆地。第二天醒来时，他们发现各自分散在不同的浮冰上。他们想尽办法好不容易重聚到一块浮冰上了，却又遭到逆戟鲸的攻击。这种食肉鲸鱼几次把头抬起挨近这块浮冰的边缘，想把上面的人以及狗和马掀到海里去。

鲍尔斯派一个人设法跳上一块小浮冰，用滑雪板把它划到岸边，然后立刻返回“安全营地”找其他人来救援。6 小时以后，救援队赶来了，他们把遇险的人和一匹矮种马刚救到岸上，那块浮冰突然又开始朝海上漂去，再也没有办法弄回还留在浮冰上的 3 匹矮种马，只好开枪打死它们，让那些不停游弋的逆戟鲸去受用。

他们到了“营房基地”，休整了整整半个月，然后才返回埃文斯角。

这次设置补给站之行对斯科特来说，既不是成功的，更不是愉快的。虽然他们走了 480 公里，而且也总算建了一个“一吨站”，但探险队的运输牲畜损失很大，差不多一半的矮种马已经死去了。这时，紧跟他出发设置第二个补给站的后勤人员也回到了埃文斯角，这队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离基地足足有 960 公里。可惜由于斯科特的计划不周，以致补给站设置的方向不对，它几乎不在下次征服南极点的路线上。

5 个多月的南极冬天过去了。阿蒙森心情焦迫地等待着春天的第一道阳光。1911 年 9 月 18 日，当太阳终于在白茫茫的地平线上探出头来的时候，他便率领 4 名队员，驾着 90 条狗拉的 5 架雪橇出发了。挪威人几乎全都是滑雪的高手，他们飞快地前进，而狗在他们的身后狂追。可是 4 天之后，暴风雪无情地刮来，气温降到了—58℃。他们顶风冒雪到达南纬 80°的地方，再也无法前进了，于是把雪橇上的物资埋在原先设置的补给站里，便往回走。9 天之后他们回到了“先锋者之家”。

首战的挫折并不使他发愁。因为他的时间充裕，再说狗比矮种马可以出发得早：当马被齐腰的积雪困扰的时候，狗可以在雪地上飞奔。

阿蒙森再一次推敲他修订了几次的计划，直到确认真的无懈可击时，他于 10 月 19 日再次出发。这次他们 5 个人，带了 50 条狗和 4 架雪橇。其他 4 个人是：奥拉夫·布加兰、斯维尔·哈塞尔、赫然尔·汉森、奥斯卡·威斯汀。

他们行进得相当顺利，顺着东经 163°线南下，每天行程 38 公里，4 天后便到达南纬 80°处。在这里贮存了他们征服南极点的一切补给品。

他们休假一天——这已经是阿蒙森的老习惯了。开始大吃特吃东西，而那 50 条狗也狼吞虎咽填饱了海豹肉。第二天，他们装满了东西，向南进发。这时，阿蒙森控制了速度，每天行进 28 公里。前途难测，他不想过早地拼耗体力。

11 月 2 日，他们来到南纬 82°的补给站。他们把雪橇上的东西装载到最大限度，因为从这里开始，今后的任何必需品都得靠雪橇随带，维持 90 天大消耗的往返行程依仗于这些狗和雪橇。

从南纬 82°起，他们每隔 5 公里便堆一个圆锥形的雪堆作为回程的路标。由于天气晴朗，几乎无风，阿蒙森把速度提高到每天 38 公里。

训练有素的格陵兰爱斯基摩狗确实是他最明智的选择。它们吃苦耐劳，鞠躬尽瘁。阿蒙森的队员时常坐在雪橇上，一边欣赏极地的奇异风光，一边

嚼着暖瓶里的热饭，真是种独特的享受。何况还有休假：星期天哪怕再适于行路，阿蒙森也不肯改变习惯，他让队员们摄影、散步，甚至进行一些不费大体力的小比赛。

阿蒙森计划为回程的需要，每隔一纬度设一个补给站。11 月 8 日，在南纬 83°设第一个补给站；11 月 11 日，在南纬 84°设了第二个；11 月 15 日，他们爬上了一座 92 米高的冰崖，在顶上设了第三个补给站。

现在他们站在陆地上了。在这之前，也就是自他们离开挪威的 15 个月以来，都是在海浪和冰雪世界中度过的，这时他们第一次看到红褐色裸露的岩石。但他们目前仅在海拔 270 米的地方，前面是一堵高不可攀的山岭，山岭里外都悬挂着冰川。

阿蒙森宣布放假一天，而自己到四周去寻找向南的通路。他登上了一座山峰，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坳口，笔直地向南延伸。他决定从这坳口突破。所剩的 42 条狗要把全部物品拉上顶峰，但一到顶峰，它们将要减少到 16 条。一想到这个，阿蒙森心里不免沉重起来，要从这些忠诚为主人服务的狗中选杀这只或那只，都是难以下手的事。

11 月 17 日，他们开始爬山。第二天，他们在 1200 米的高处扎营，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冰架了。11 月 19 日，他们登到了 1580 米，稍稍休息一下，设置了最后一个补给站后，就继续向上攀登。当天半夜时分，他们终于登上了 3340 米的极地高原的顶部。从这里开始再没有更多的山岭阻挡他们的前途。但是这也不等于是一马平川，地面上由于缺少土壤和没有植物，到处都是怪石狰狞，而且由于积雪和冰川，暗藏着许多缝隙，稍不小心就会酿成灭顶之灾。

在这里，阿蒙森和队员们第一次相互推诿着一件工作，那就是宰狗。但是为了征服南极点，不得不作出残酷的选择，付出心灵创伤的代价。他们在那些如此驯良忘我的狗里面磨蹭了整整一天，才选出 24 条较弱的狗含泪杀掉。阿蒙森也第一次动了恻隐之心，使计划中的 16 条增加了两条。

他们把这地方称为“屠宰营”。用杀死的狗肉喂饱其他的狗，剩下的埋起来建一个临时补给站。11 月 21 日是个好天，阿蒙森宣布休假。半夜起了风暴，这休息一直延长了 4 天。11 月 25 日，天转晴了，他们启程，临行前，队员威斯汀把一根滑雪杖插在“屠宰营”上，以示纪念。

其后的 12 天，他们都是在坎坷不平的冰川面上行走，天气阴沉多云，有时看不清道路，稍不谨慎便会落到冰隙里去。他们 5 个人用绳子系住腰部串成一线。这样，一个陷落，众人就能迅速把他救起来。

12 月 7 日，阿蒙森到达南纬 88°23′——这是沙克尔顿创造的南进记录，从这里往南，每一步留下的都是人类崭新的脚印！阿蒙森按捺住欣喜的心情，下令休假。他知道，除非是意外的灾难，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拦他们到达南极点。他们带着充足的食物，还有为以防不测之祸、随时都可杀掉充饥的 18 条狗。

12 月 13 日，他们到达南纬 89°45′，离南极点只有几十公里了。这时阿蒙森的脸上浮出了笑容。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成功，队员们像过圣诞节的小孩子一样。

第二天，也就是 1911 年 12 月 14 日，走到前头的阿蒙森从雪橇跳下来，大声喊道：“停下，我们胜利了！”为以防万一，他再次进行精确的测定，确实无错，他们真正到达了南极极点！这里是地球自转轴的最南端，是南半

球所有经线的汇聚之点，位于极地高原的中央，海拔 3360 米。他们欣喜若狂地支起了帐篷，在极点插上了挪威国旗和“先锋”号的三角旗。为了不给人以口实和把柄，他们以南极点为中心，走了个近 20 公里的大圈，并且就像以前设置补给站一样，在 90°的点上，交叉插上 4 行旗帜，每行旗帜都长达 10 公里，这每行旗帜的延伸方向不言而喻都指向北方。

阿蒙森探险队在南极点度过了 3 天。他们堆了个圆锥体作为标记，顶上放着一架雪橇。在连续进行 24 小时的太阳运行观察之后，便于 12 月 18 日离开极点。离开南极点时，阿蒙森在帐篷里留下了一封给挪威国王哈康的信，并给斯科特写了一张便条，请他把信转送到挪威。一年前，他对彭内尔说的关于要给斯科特一封信的话，在南极点兑现了。

1912 年 1 月 6 日，他们顶着狂风回到“屠宰营”。这时他们的狗已减少到 12 条，其余的 6 条在途中杀了给其他的狗充饥，但活着的狗依旧饿得够呛。“屠宰营”已经被风刮得面目全非，幸亏那根滑雪杖还竖着，所以他们迅速挖出埋着的狗肉，让饿慌了的狗饱餐一顿。

这时，风暴停息，天空晴朗。阿蒙森探险队滑着雪快速前进，把狗拉雪橇远远抛在后面。他们像在进行一场障碍滑雪赛一样，很快下降了 3000 米，来到了罗斯冰架。这场“比赛”的唯一损失是一条狗落入冰隙中死去。

在罗斯冰架上，他们的行进迅速加快到每天 40 公里，每隔 5 天休假一天。

1 月 25 日，阿蒙森等 5 人全都返回“先锋者之家”。他们归来得如此迅速，以至于留守在那里的探险队员还以为他们因南极点之行失败而半途告终呢。

阿蒙森以 99 天的时间，建立了举世闻名的征服南极点的功勋。1 月 30 日，阿蒙森登上了“先锋”号，离开了南极洲。于 3 月初，“先锋”号抵达澳大利亚的霍巴特。立刻，电讯把他的创举传到了全世界。同年夏，他回到了挪威，受到了全国上下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他把 11 条与他共同患难的‘南极老狗”送到他的别墅里，使它们安享天年。

然而，不幸的斯科特没有完成他的宏愿，和他的队员们倒在了南极。当救援人员找到他们的尸体时，发现斯科特的旁边是个罐头盒，里面有一根用鞋带做成的灯芯，他用这根灯芯燃尽了最后一滴煤油，以记他的日记。在另一边放着一只大袋子，里面是企图运回基地的 15 公斤重的岩石标本。

科学探险的转折点

1929 年的美国海军中校瑞查特·伯德的成功，是极地探险机械、科学时代正式来临的转折点。他使用飞机——这是最新和最重要的极地探险的技术革命——到达了南极点。

自从威尔克斯到达南极海以来，经过 80 年，美国人首先正式进行南极探险。他们动员了 4 艘军舰，把 3 架飞机以及无线电设备、电化机器、电话及 74 名队员送上了罗斯海鲸湾，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小阿美利加”。

为了进行广泛的地理及地质调查，伯德立刻和两名队员进行第一次南极点飞行。

1929 年 11 月 29 日，伯德沿着阿蒙森所走过的路线飞行。从现代目光来看，也许这是十分简单的事，但当时却十分困难，原因一则是飞机性能尚不完美安全；二则缺乏极地飞行的经验。南极的一片银白闪光，照得他们眼花缭乱。

他们飞到罗斯冰架和极地高原的分界线时，前面的山太高，伯德的飞机装满了行李和食品，根本没法飞越。他只好顺着极地高原的边缘寻找低凹的山拗。当时，飞机的引擎已尽了全力，发出阵阵吼声，眼底下都是陡峭怪异的冰川，旁边则是无法穿越的高山。突然间，飞机一震，顿时失去平衡，高度慢慢下降。伯德立即下令抛掉 60 公斤食物，才使飞机恢复了高度。然而，没过一会儿眼前出现了更高的山，引擎发出了怵人的悲鸣，无法飞得再高，而两旁全是无法飞越的高山。这就意味着他只能继续冒险前行而不能后退了。为了以防万一，伯德只好抛弃所剩的全部食物，大约有 60 公斤重。他知道，他这是破釜沉舟了，飞机在返回“小阿美利加”以前，绝不能降落，否则他们一定会饿死。

就在这时候，飞机的前方有一座更高的山出现了，而在这座山的坡端有一块较为开阔的空间，足够飞机回旋拐弯。这样伯德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打道回府，或勇往直前。他选择了后者，虽然他知道为此可能落得个机毁人亡的下场。他的手心全是汗，咬着牙提升着操纵杆，飞机呜咽着，艰难地爬升，擦着山头飞了过去，一时间，随机的另两个乘员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现在伯德已经松了口气，望着单调而奇妙的极地高原，恢复了信心，继续向南飞行。

南极点终于到了。这是人类第三次来到这个神奇的地方。

伯德乘飞机的到来是人类对南极点的第一声新时代的问候。

伯德在南极点上空绕了两圈，然后从飞机上投下裹着重物的美国国旗。他们看着它飞快地坠落，旗杆正好直端端地插在雪地上。为了表示对斯科特的敬意和哀悼，他们还投了面英国国旗，但这面国旗却被狂风卷走了。

伯德当天傍晚便回到了“小阿美利加”，受到全基地人员的欢迎。他一天往返 2575 公里——相比之下，阿蒙森在 18 年前要步行 99 天才能做到。

中国的远征

中国对极地的参与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最早踏上南极洲的中国人是董兆乾和张青松。他们在 1979 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作为科研工作者，访问了该国在南极的莫森站。第二年，他们再次受到邀请奔赴南极。在这次与澳大利亚的联合考察中，张青松成为中国在南极越冬的第一人；而董兆乾则首次代表中国历险冰海，闯荡南大洋。

1980～1983 年，中国走向南极的约有 32 人，如谢自楚、位梦华、罗钰如……其中最惊险、最有戏剧意义的要属蒋加伦了。

蒋加伦是个生物学家，他是 1982 年 10 月到达澳大利亚在南极的戴维斯站的——在中国艰难的起步中，澳大利亚是第一个伸出友好之手的国家。他是去进行沿海水域浮游生物分布研究的。第二年 2 月 3 日，他与澳大利亚的伯克博士驾着小艇到 9 公里外的爱丽丝湾去调查，由于艇小浪大，不慎落入海中，伯克身强力壮，很快游到了岸边，而当他站起来回头一看，蒋加伦还在冰凉的海水中折腾。小艇的落水点距岸仅 30 米。蒋加伦本来善于游泳，但由于冷冻和紧张竟然伸不开手脚。他后来好不容易爬上一块浮冰，想从浮冰上走到岸边，但僵直的腿失去了往日的灵便，又一个跟头摔进海里。伯克见状立刻再次下水把他拉了上来。

这时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无法与戴维斯站联系，所以只能等待救援——预定下午 4 点会有直升机来接他们回去。这就是说，他们得在冰原上坚持 6 个小时才能获救。伯克开始跑步，而蒋加伦则反复运动麻木的四肢，撑爬起来，再倒下去，倒下去再爬起来，同时做中华传统的气功，以维持其生命的延续。

等到直升机准时到达的时候，蒋加伦的体温已降到 30℃。他完全冻僵了，但神智还清醒。经过抢救，蒋加伦居然恢复了健康，并且按照原计划在戴维斯站越冬考察。南极遇险，对世界各国来说算不得一件大的新闻，但蒋加伦落水受难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牵动了无数民众的关切之心。他归国之后见到了极其壮观的欢迎场面。这场面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陌生的南极所产生的热切关注。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会像中华民族那样，经常会发现自己生活在古代辉煌的荣耀和近代无以复加的屈辱之中；也不会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社会的潜意识里面纠缠着自豪和希冀雪耻的心理。郭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1983 年 5 月，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加入《南极条约》的决议。同年 9 月，郭琨参加了《南极条约》的第 12 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有 30 多项，但每当要表决时，便让中国代表团出场等候，因为中国仅是条约的缔约国而不是协商国。要取得具有表决权的协商国资格，必须按规定在南极建有自己的科学考察站。不难想象郭琨当时的复杂心情：痛苦和愤怒交织在一起。但他也清楚：世界是现实的，它并不同情任何弱者，为了使它对中国刮目相待，中国必须做出切实的行动。

归国之后，他四方奔走，终于得到有关部门支持。而他自己，则成了中国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队的队长。

新的一页就在这里揭开，未来从这里开始……

1984 年 11 月 20 日，以陈德鸿为总指挥的南极洲和南大洋考察队从上海

港正式出发。其中准备登陆的队员为 50 名，以郭琨为队长；大洋考察的队员 26 名，由金庆明率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适宜冰海航行的船只，就采取双船编队：1.5 万吨级的“向阳红 10”号和 1.2 万吨级的海军“J121”号。两船共载了 589 人。从南极的考察史看，如此庞大的队伍也属少见。

船队于 11 月 26 日过关岛，12 月 1 日穿越赤道。接着便径直向西南方向驶去。12 月 13 日两船进到南纬 40°～50°线的南太平洋海域，这里便是著名的咆哮西风带。12 月 18 日，考察队通过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进入了大西洋，接着停靠在世界最南的城市乌斯怀亚。

考察船队在该市稍事修整后，于 12 月 22 日再次起航，进入德雷克海峡。两天后，过南纬 60°。再过一天，即 25 日，船队避开冰山，已见到登陆考察队的目的地乔治岛。

乔治岛是南设得兰群岛的组成部分，可看作是南极半岛的海上延伸，“向阳红 10”号和 J121”号于 12 月 26 日驶入乔治岛的民防湾。几经选择，考察队找一个三面环山的小海湾，将其命名为“长城”湾，决定在此建立中国的第一个南极常年考察站。

29 日，考察队开始从船上卸货。31 日，考察站进行奠基。然而，南极开始就给这些新到的中国人送来了“贺礼”：狂风开始大作，白浪像山似地涌来，汹涌的带着冰凌的潮水扑向长城湾。顷刻间，潮水把已经卸上海滩的物资全部淹没，海滩上能见度也骤然降低，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他们还是以中国人特有的坚韧在舍命工作。他们驾着满载的小艇，不知饥困，眼睛熬得通红，冒着凛冽风雪紧张施工。1985 年 2 月 20 日，考察站终于正式落成。

这就是中国的“长城”站。他们还把该站北面的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湖命名为“西湖”。“长城”站离北京 1.7502 万公里，它的天文坐标为西经 58°57′51.9″、南纬 62°15′59.3″。

在陆上考察队建“长城”站的同时，“向阳红 10”号于 1985 年 1 月 19 日离开民防湾，驶向冰山密集的南大洋，进行科学考察，该船于 1 月 24 日进入南极圈，它于是成为中国第一艘闯入极圈的考察船。2 月 8 日，大洋考察队完成了最后一个项目，开始掉头北返，于 17 日回到乔治岛的民防湾。

2 月 28 日，“向阳红 10”号和“J121”号留下 8 名越冬队员，启程返航，到 4 月 5 日安抵上海港。

由于中国在南极有了常年考察站，所以于该年 10 月，中国成了《南极条约》协商国。

而于此前，张坤诚和高钦泉于 1985 年 1 月 10 日成为第一批踏上南极点的中国人。

“长城”站经过中国第二次、第三次及第四次南极考察队的扩建、完善，已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基地。但由于它位于南极圈外，离南极半岛尚有 120 公里，所以它也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无法对南极大陆作更有价值的研究。于是中国决定在东南极建立第二个常年考察站。

这次新的南极远征，仍由陈德鸿任总指挥，郭琨任考察队长，但运载船则由“极地”号担任。它具有两层船体，有相当的极海抗冰能力，据试航表明，它的性能良好。经过充分准备后，“极地”号于 1988 年 11 月 20 日从青岛起航，17 天后，便抵达了澳大利亚的霍巴特港。稍作停顿，便向南极大陆的普里兹湾进发。

“极地”号刚驶进西风带，就遇上了可怕的强旋气。“极地”号尽管有万吨以上，但仍然显得无能为力，时而被托上浪尖，时而又被推入波谷。一排排狂浪越过 10 米高的驾驶室扑向船尾，这时船看上去很像一艘巨大的潜艇。4 天之后，“极地”号终于跨过了南纬 60°，把西风带抛到了后面。

12 月 18 日，“极地”号在东经 101°32′、南纬 69°22′处进入浮冰区，越往南浮冰越密集。到了 21 日，90%的海面为浮冰覆盖。面对如此密布的海冰，为了寻找通道，船载直升机先后 6 次起飞，为船导航。这时，大片大片的浮冰随着海流，直冲船体，发出令人胆颤的撞击声。到最后，“极地”号只能以一节的速度缓慢行进。经过 5 天迂回曲折的航行，它终于在 12 月 23 日下午抵达普里兹湾。

当考察队员看到南极大陆裸露的崖岸和远处连绵起伏的拉斯曼丘陵地时，其兴奋心情溢于言表。但是“极地”号无法靠岸。8 公里宽、2 米厚的陆缘冰横亘在船只和海岸之间。因为航程为流冰所耽搁，他们已失去了不少时间，现在又无法及时卸货，个个忧心如焚。时间继续流逝，直到 1989 年 1 月 14 日 22 时，“极地”号才到达离预定登陆点的 400 米处。这里水深 30 米，而不远处的大陆冰盖厚度则为 1800 米。

但是，正当“极地”号准备用小艇卸运物资时，冰情突变，接连发生了罕见的特大冰崩，使船再次陷入困境。第一次冰崩点距船仅 1 公里，它是在船到达 3 小时后发生的；一个小时后，又遭到了第二次冰崩的袭击，距船约 3 公里；再过一个半小时，第三次冰崩又发生了，这次距船约 4.5 公里。3 次冰崩的断面长度为 3.5 公里，崩落的冰盖激起几十米高的巨浪，推动冰山向“极地”号撞来，其态势极为可怖。

“极地”号连忙启锚，作机动规避。但终于躲闪不及，船体发出一声巨大的响声，船首几乎被浮冰撞出个 1 平方米左右的大洞。接着，冰山和碎冰块排山倒海般地涌来……“极地”号并未被撞翻，但它的四周俱为流冰所封死。陈德鸿立即作了应急措施，用直升机把 40 名考察队员运到陆地上，分别安置在附近的前苏联“进步”站和澳大利亚“戴维斯”站里；同时他决定：如果“极地”号最终被困冰海，全体队员就都在南极越冬。

1 月 17 日及 18 日，“极地”号左侧又发生了 3 次冰崩，但有惊无险。就在“极地”号进退两难的时候，冰情意外地发生了新的转机，在船的前方，两座冰山漂浮的速度不一，中间出现了豁口。陈德鸿当机立断，下令“极地”号铤而走险，冲出豁口。结果转危为安，1 月 21 日，“极地”号摆脱了冰的围困，来到了宽阔的水域。

他们很快地找到了新的登陆点。这些忘我的中国人拚命地干活，以 15 天时间，把 67 个集装箱和 3 个大油罐从“极地”号运到岸上。接着又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到 1989 年 2 月 26 日，建起一个面积为 1654 平方米的常年考察基地。

中国人以国民革命的伟大先躯的名字来命名该考察站——“中山”站。它是中国在南极大陆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距北京 1.2553 万公里，离乔治岛上的“长城”站为 4986 公里。

2 月 27 日，“极地”号启锚返航。于 4 月 10 日回到青岛。而留在中山站的站长高钦泉和其他 19 名队员，成了第一批有组织地在南极越冬的中国人。

另外在 1983 年，应新西兰邀请，李华梅有幸成为第一个登上南极大陆的

中国妇女。

徒步横穿南极

1986 年 4 月，正值北极的春天，法国探险家路易·艾蒂安在单人徒步前往北极的途中，迎面正好遇见徒步到北极返回的美国人威尔·斯迪戈。他们有共同的兴趣，为人也都豪爽，所以谈话十分投机，在酒酣饭饱之际，竟然产生了相同的设想：下一个目标是徒步横穿南极。同年 10 月，他们两人再次重聚在美国纽约，商定了初步的别出心裁的探险方案：美国、前苏联、中国、法国、日本、英国等国各派遣一名队员，参加 1989 年的徒步横穿南极的行动，路线为南极半岛—文森峰—南极点的阿蒙森·斯科特站—东南极高原—前苏联的东方站，终点为前苏联的和平站。

1989 年 7 月 25 日，六国横穿队按计划来到乔治岛，下榻在中国的“长城”站。探险队的 6 名队员除美国的斯迪戈队长外，其他几位是法国的艾蒂安、前苏联的维克多·波亚尔斯基、中国的秦大河、日本的舟津桂三和英国的杰弗·萨默尔。同他们一起参加探险的，还有 41 条在英雄时代大显身手的爱斯基摩狗，它们将是这次徒步探险的得力助手。

7 月 28 日，徒步横穿队从南极半岛拉尔森冰架北端的海豹冰原驾着雪橇正式踏上征程。从此，揭开了南极探险史的新的一页，开始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西向东横穿南极大陆的壮举，而以往的南极横穿活动是由南到北，相对距离要短，何况使用的是电动雪橇。

他们出师并不顺利，计划每天走 10 小时，每小时 5 公里，但由于队员们暂时不适应滑雪板，所以速度缓慢。尤其是秦大河，别说滑雪，甚至连滑雪板都没见过，每天只好徒步跟着雪橇小跑，再加上他戴了副近视镜，目力不好，时常被冰裂绊跤。所以他们头 6 天才走了 100 公里。8 月 4 日，暴风雪“款待”了他们，使他们为此休息了两天。风雪过后，他们继续前行。但好景不长，只走了一天，狗拉着雪橇在下一个冰坡时，速度失控而把两架雪橇翻倒，其中一架主梁断裂，他们又耽误了一天的行期。

这时秦大河已经学会了滑雪，虽然依旧战战颤颤，但毕竟跟得上队伍了，所以行进速度明显加快。到 8 月 11 日，他们前进了 24 公里，13 日则达 28 公里；他们于 12 日跨过了南极圈。到了这里之后，环境更加险恶，沿途都是难以预测的冰融洞。它们表面看不出来，与冰原无异，其实仅是一层薄冰覆住下面的空洞。这些洞有的深达 40～50 米。因此他们用绳把人串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前进。8 月 25 日，3 条拉雪橇的狗掉进了冰洞，在半空中大吠大叫。人们赶去把其中两条拖了上来，而另一条则在挣扎中套绳脱落，掉到十几米深的洞底，依旧狂吠不已。艾蒂安靠绳索下去，把它拖了上来。

8 月 26 日，他们到了预定的物资补给点，但他们寻了一整天，也没发现任何标志。最后他们确认，补给点已被暴风雪埋在 3 米深雪下，根本无法取到，于是继续前进。这时，他们已经完全熟悉了他们的狗，他们发现有条叫舒利的雌狗，颇得狗群的恩宠。他们就让舒利当了领队狗，而其他的雄狗不用驱赶，就会飞速前跑。

过了融冰洞区，他们就沿斜坡向海拔 5000 米的梅依豪森冰川挺进。8 月 29 日，没有风，雾却很重，能见度极差。几天里他们只走了很少的路。到 9 月 1 日，他们被暴风雪再度困住了。待 4 日天气稍好，就加速前进，到了 9 月 5 日，他们登上了梅依豪森冰川的顶部。到此时他们随带的食品已经匮乏了，就冒着又开始刮起的风雪寻找补给点，但是这个补给点依旧浑然无迹，

看来又是被大雪“吞”掉了。幸好无线电联络还算通畅，6 个小时后他们呼来了一架水牛式飞机，运来了救急的给养。

从梅依豪森冰川顶往后的路，地势平坦，坚冰结实，颇适于雪橇滑行。但暴风雪却接连不断，他们从 9 月 6 日起一直躲在帐篷里，直到 9 月 12 日放晴为止。在这段时间里最幸运的是日本的舟津桂三，他在听无线电时，居然听到他未婚妻遥祝他平安的声音，于是他近乎疯狂地大喊大叫了一阵。13 日，大雾复起，他们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失去了联系。走在最前头的秦大河和英国人萨默尔感到情况有异，立刻停了下来。他们取出绳子，拴住秦大河的腰，让他尽绳长所及，以站立不动的萨默尔为圆心，作环行圆周运动。待到秦大河终于在茫茫白雾中撞上了前苏联人波亚尔斯基时，才算松了一口气。接着他们像登山队员一样摸着绳子向前走。到 14 日，他们到了新的补给点，谢天谢地，这回它标志醒目。

9 月 16 日，他们很顺利。也许是掉以轻心了，两架雪橇突然带着 4 个人沿陡坡以飞行速度下滑，瞬间便掉入 300 米深的谷底。只有秦大河和萨默尔见事不妙，立刻悬崖勒狗。好在谷底积雪松软，人和狗都安然无恙。以往的几次教训使他们想出了个新法，用绳子把 3 架雪橇联在一起，这样既可防止掉队，又可免于滑落。不过狗却不听话，它们一齐扑上去把串联的绳子咬成几截，他们只好作罢。

9 月 24 日，是他们徒步行走的第 60 天，至此，他们已超过了 900 公里的行程。天气时好时坏，他们不停地往前走。到了 10 月 31 日，他们来到了文森峰脚下，这时他们已经前进了 1500 公里。狗大约由于南极春天的到来而躁动不安，那条舒利惹得整个狗群天翻地覆。他们无奈，只得召来飞机，把它运走。

11 月 7 日，是横穿队的吉祥日，这天阳光少见的明媚。昨天他们创造了日行 47 公里的最高记录，今日他们又走了 47 公里到了帕特里特山大本营。该大本营有几间装供暖设备的房子，装备了大型无线电通讯设施。秦大河这时才与他妻子第一次通了话，当听到她总是那么温柔的乡音时，他不禁落下了泪。

帕特里特山大本营是他们奔赴南极点的唯一的休整点。他们在这里休息了 3 天，洗澡，拚命地吃喝和睡觉。10 日上午 9 时，他们再度出发。以往的历程已经锻炼了他们，他们不再忧心忡忡，而是信心百倍。他们每天的行进速度很可观，不少于 32 公里。21 日，他们开始进入斯尔山脉，地势骤然升高。到中午，他们的左侧发出一声巨响，一座约 50 米高的冰川崩断，无数冰块飞泻而下。他们连忙驱狗向左侧的山坡猛逃。25 日，他们到了最后一个补给点。但由于周围冰崩不断，他们没有休息，只是往雪橇上装了些食品，就继续前行。27 日，他们到了南极高原的脚下，在这儿，海拔从 900 米直升到 3000 米。他们找了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安下帐篷，睡了两天，在养精蓄锐后开始向上攀登。

12 月 12 日凌晨 3 时，六国横穿南极大陆探险队终于到达了南极点。这是继阿蒙森后人类又一次以狗拉雪橇的方式来到这里。

他们在南极点迎来了阿蒙森首次到达极点的 78 周年纪念日。横穿队队长斯迪戈对着记者抱起了他的两条狗：萨姆和亚格。它们是世界上唯一两只既到过北极点又到过南极点的狗。后来，当记者问到他的横穿队员在充满艰险的途中想到的是什么时，他说：“和平、爱和家庭。”

15 日下午，横穿队开始踏上征途的第二阶段。也许他们还留恋阿蒙森—斯科特站的舒适生活，所以行动缓慢，只走了 5 公里。从 16 日起，才恢复了正常，这天走了 38 公里。他们现在行进在不可接近区。所谓不可接近区是因为该区域离海的距离同样远，不是前往南极点的捷径，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徒步涉足过。但不久他们发现，路并不比以前的难走，相反它反而平坦得多。最大的困难是严寒。虽值南极的盛夏，但气温依旧一直在—26℃。这个严寒耗费了他们极大的能量，以致人均体重下降了 4.5 公斤。

12 月 26 日，他们度过了一个简单的圣诞节，然后向着下一个目标——前苏联“东方”站前进。虽然路面状况开始转坏，还有许多冰沟，但他们的速度还是保持在日行 40 公里左右。1990 年元旦，他们也没因为是节日而停止走路。1 月 8 日，他们感到疲惫不堪，决定休息一天，“大力神”飞机及时给他们运来了补给品。到此为止，横穿队已离开南极点 850 公里，距“东方”站还有 330 公里。

他们现在一步步地接近“东方”站。可是任凭他们怎样焦急，无线电通讯怎么也与“东方”站联系不上。他们甚至由美国方面电告莫斯科，希望得到“东方”站的准确地理坐标，但依旧毫无结果。前苏联队员波亚尔斯基的情绪激动，他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替其他队员和狗引路开道。

气温开始降低了，现在已达—31℃了。据“东方”站的资料记录，该地区曾到达过—129℃。他们必须及早行动。17 日，他们只走了 30 公里。照他们掌握的情况看，“东方”站就在他们四周的 8 公里范围内，但如果没有得到“东方”站的信号，他们就会和它失之交臂。于是他们又急切地向后方发报，横穿队的法国总部得知此消息后，立刻与列宁格勒的前苏联极地研究所联系。极地研究所马上电传给“东方”站，这样困难就迎刃而解，横穿队计划 18 日抵“东方”站。该站有 40 名前苏联科学家，大都是波亚尔斯基的同事和朋友，他们热情好客，特地为横穿队组织了一次小型晚会。

22 日，横穿队离开“东方”站，踏上最后的约 1380 公里的路程。途中积雪很厚，气温也继续下降，好在前天有一辆极地拖拉机从“东方”站去“和平”站拉给养，把路面压得平整结实，恰好给他们开了路。所以他们的行进速度惊人，在 23 日，居然创造了日行 55 公里的记录。2 月 4 日，他们到了“青年”站，它也是前苏联的考察站，但由于隆冬逼近，里面的人员都撤走了，只给他们留下了补给品。他们休息了一天，接着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他们在 3 月 1 日遇到了罕见的暴风雪，于是赶紧扎起帐篷躲避。此时他们离最后的终点“和平”站只有 20 公里的路程。暴风雪到第二天仍未停息。下午，舟津桂三走出帐篷去给狗喂食，但过了两个小时还未见回来。他们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就用绳子彼此串联起来，外出呼喊搜寻，直到天黑，也没见到舟津桂三的踪影。他们这晚几乎没有睡觉，一大早就又出去寻找。这时天已经放晴，四周的视野开阔。他们看到 200 米外有一个雪堆，就提心吊胆地走去。突然那雪堆里钻出一个人来，大喊：“我还活着，我还活着！”

原来，舟津桂三在 14 个小时前迷失了方向，就挖了个雪洞钻了进去……大家都朝他奔去，哭着，笑着，喊着，把他抬了回去。接着他们飞快地打点行装，马不停蹄地往“和平”站冲去。3 月 3 日 20 时左右，他们终于走完了地球上最难走的 6300 公里的路程，到达终点——前苏联的“和平”站，波亚尔斯基跑在最前头，紧跟在他后面的是斯迪戈，再后依次是萨默尔、艾蒂安、舟津桂三和秦大河。当斯迪戈和艾蒂安一走过前苏联科学家用布条做的终点

线时，便紧紧拥抱在一起，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失声大哭——1986 年的梦终于实现！

此时的秦大河也热泪盈眶，说实在话，他参加横穿队之时，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现在他活下来了，自始至终代表着中华民族参与并完成了这次史无前例、世界瞩目的伟大壮举。而他自己也成了中国第一个徒步登上南极点的人，第一个由西向东横越南极大陆的人。

征服北极

红胡子和他的子孙们

900 年，一位名叫冈贝伦的诺曼人乘船从挪威出发，想前往冰岛，但被强风吹离了航线，只得向西前进。不久，他看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但那令人惊骇的洪荒景象吓着了他，所以他并没有登陆。他掉头东返，几经周折才到了冰岛。

于是在冰岛人中间，开始流传关于那片未知土地的故事。不过前往那片土地的航程太危险了，冈贝伦所叙述的流冰和浓雾，冷却了他们的冒险热情。直到 80 年后，才有几个挪威人出于无奈才尝试前往那一片土地。

这一次航行是由一名北欧海盗船长率领的。由于他有一把火一般的红胡子，所以都称他为红胡子埃里克。

982 年，红胡子埃里克在海上漂泊，他向西直驶，终于见到了一块陆地。他沿着海岸转了一大圈，确定这是个巨大的岛屿，就登陆上岸，发现草原上散布着松树和柳树，那里夏天暖和，适于植物生长；而在浅湾和内港，到处都有海豹在嬉戏，鲸鱼在游弋。他欣喜若狂，于是把该岛命名为格陵兰，意思是绿色的大地。

他们在岛上安了家，建起了许许多多 30 米长的房子和谷仓。这片居住地后来被称为“东开拓地”，也就是尤里亚尼合浦，当时成了一个相当繁华的地方，有 190 座农场和一些教会及修道院。

红胡子埃里克的儿子里夫是第一个到达北极新大陆——也就是北美洲在北极圈内的大地的幸运儿。

1001 年的夏天，里夫的船在大海中遇上了风暴。咆哮的海浪涌上了甲板，海水一直淹到了水手们的腰部。里夫临危不惧，从容指挥，与水手们和衷共济，渡过了险境。风暴渐渐平息下来，里夫抬头往远处看去，在视力所及的西边，他看到一条由北往南逶迤的海岸线。“这块陆地！”他高声呼叫，却又不由得皱起眉头，因为眼前的这块陆地平坦低缓，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既不可能是土层瘠薄的冰岛，也不可能是岩石赤裸的格陵兰。于是他认定，他发现的是块前所未闻的新大陆。

里夫登上了大陆的海岸后，把登陆点命名为维兰，并在那里盖了房子，度过了一个冬天。他计划在这里建立一个居民点，所以他返回格陵兰，准备招兵买马。但他回去之后，父亲埃里克死了，他只得接管父亲遗留的农场，从此结束了他的海上生涯。

里夫的弟弟索瓦尔德却决定迁居维兰，不过他极为谨慎，认为在正式迁居之前有必要实地察看一番。因此他备了船只，带着水手循里夫的航线到了维兰。他在维兰里夫盖的房子里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在春季和夏季，索瓦尔德对附近的海岸和内陆进行了一番考察。然而他没有里夫那么幸运，他遇到了当地的土著，几个手势不合，便与他们发生了冲突。索瓦尔德被利箭射中，不久就死去。他的水手把他草草埋葬之后，萧瑟的秋天便来临了。水手们不得不在这里度过了极为凄惨的第二个冬天。来年，他们才回到格陵兰。

里夫的第二个弟弟李尔斯坦是个性格鲁莽的硬汉子，他决计要找回他二哥的遗体，就匆匆驾船出发了。但他的命运更加不济，一连串的风暴刮得他晕头转向，待到风平浪静，他却到了冰岛的东面。他又气又急，得了热病，

不久便死了。

1003 年的秋天，一个名叫索芬恩·卡尔思夫尼的冰岛人来到了格陵兰。他是位商人，与红胡子埃里克的 3 个儿子早就熟识，索芬恩得知李尔斯坦已不在人间，便娶了他的寡妻格里德。索芬恩也迷上了维兰，决定到那里去定居。

1004 年，索芬恩组织了一支远征队启程去维兰。这支远征队有 3 艘船 250 个人，包括一些家属，并且带了许多牲畜——这是世界上第一批怀着生活的希望，飘洋过海驶向北极新大陆的人们。

他们顺利到达了维兰，并在那里过冬。格里德为索芬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斯洛尔里，他是第一个诞生在美洲的北欧人。第二年春，他们向南行驶，来到了一个海湾。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野麦”和“藤蔓”。沿着海滩，他们挖了一些深坑，退潮时鱼儿便会留在坑中被捕获。森林里有数不尽的野生动物，他们猎取这些动物作为食物，每天都享受鲜美的野味，生活得愉快舒服。

一天，他们突然看到河面驶来许多又狭又长的独木舟，独木舟上全是面貌奇特、黑皮肤、黑头发、大眼睛、宽面庞的土著。这些土著看到金头发、蓝眼睛的北欧人也大吃一惊。双方对峙观察了一会儿，然后土著就划着独木舟走了。

第二年春天，这些自称斯克雷林人的土著又来了。他们带来了一些野兽的皮毛，想与北欧人交换闪闪发光的刀剑和长矛，但索芬恩拒绝了。接着土著看上了北欧人带去的红布，他们想用红布缠在头上使自己变得英武勇猛。交易开始时公正无欺，后来北欧人变得贪心了，他们把红布条剪成一指宽，但诚实的土著人依旧用等量的毛皮交换。

有一次，双方正在交易，索芬恩饲养的几头牛突然大吼起来，吓得土著魂不附体，立刻跑回了独木舟。3 个星期后，土著在一片呐喊声中杀了过来，接着就发生了武装冲突——杀声震天的土著和狂暴怒吼的北欧人之间的一场血战。

这些斯克雷林人尖叫着向北欧人进攻。在战斗中他们使用了一种莫名其妙、然而使人望而生畏的武器。这种武器是一根木棒上绑着一个黑色的圆球，大约有绵羊肚子那么大，敲在人头上时，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声音。索芬恩和他手下的人都吓坏了，边打边撤，最后到了背临悬崖、无路可退的境地。这时，红胡子埃里克的私生女弗雷蒂斯挺身而出，扯开自己的上衣，披散头发，一边用剑在自己的胸脯上猛拍，一边尖声嘶吼。看到这景象，已经胜利在望的斯克雷林人一下子愣住了，以为遇到了正在施展妖法的魔女，拔腿就逃，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以后，索芬恩不断遭受到斯克雷林人的骚扰。他们在美洲大陆勉强地挨过了两年，实在无法再住下去，最后终于驾船离开了新大陆。

富兰克林之死

19 世纪初期是北极探险蓬勃开展的时期。当时的英国政府出于对世界海权的关注，极为重视北极地区的探险。而 19 世纪中期，富兰克林北极探险队谜一般失踪，其 100 多名队员无一生还。这一悲惨的事件，曾被人们称为走向北极的“死亡大进军”。

约翰·富兰克林生于 1787 年，他的父亲是英国林肯郡的一家杂货店主。富兰克林从小就好幻想，对商业毫无兴趣，所以 14 岁就偷偷离家，投身于皇家海军，当年便参加了旧哥本哈根战役。1802 年，在一次特拉法加海战中，他所在的战舰有 300 名士兵阵亡，几乎全舰覆灭，但他却大难不死。由于他的勇敢机智，16 岁便被破格提升为海军上尉。

幸运是把双刃剑，它可以使人平步青云，也可以使人变得唯我独尊。少年得志的富兰克林很快就养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他很少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做事往往凭他一锤定音。这种品质在平常的日子里可能会带来极大的麻烦，可是在严酷的、常常容不得任何犹豫的环境中相反会有极大的益处。

1818 年，他被任命为一艘探险船的指挥官，到了北极考察冰山。船员们被那恶劣的海况吓得脸色惨白，操作失误，要不是富兰克林临危不惧，从容指挥，探险船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1821 年，富兰克林的北极探险使他成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他在加拿大北极区考察了 2000 公里的漫长海岸线,但一连串的厄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开始是探险船触礁沉没，后来改乘爱斯基摩人的独木舟又只只漏水，最后在徒步行走时食品不翼而飞，两名随行的伙伴为之活活饿死……可是富兰克林又是大难不死，正当他卧雪待毙的时候，巡猎的爱斯基摩人偶然发现了他，他喝鹿血，啃半生的海豹肉，孱弱的身体居然奇迹般地得到康复。第二年 7 月，他到达加拿大哈得逊湾一家商行的驿站时，人们还以为他是幽灵复世呢。由于这次艰苦卓绝的探险，富兰克林被女王授予爵士封号，随即又被提升为舰长。

1845 年 5 月 19 日，富有北极航行经验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受大英帝国海军部派遣，率领两只当时最先进的新式轮船“ 恐怖号 ”与“ 阴阳界号 ”，在泰晤士河的一个港口启锚，开始了当时人类声势最大的寻找“ 西北航道 ”的远航。开始，一帆风顺，船队短暂停靠在格陵兰岛西岸以后，又安然无恙地穿过了兰开斯特海峡，当年夏季，安抵比奇岛附近海面。这是两个海峡的交汇之处，当时，向西与朝北的水路，都是畅通的。此刻，富兰克林爵士以及他的 128 名船员，士气一定非常高涨。因为英国政府允诺，这一回，作为第一个打通西北通道的人，可以得到 20000 英镑的重赏。能够到达北纬 89 ° 的船只，则可得到 5000 英镑的奖励。船员们几乎都不怀疑，自己是这笔巨款的获得者。因为，他们驾驶的这两只排水量分别为 370 吨与 340 吨的三桅帆船，装备有蒸汽机、螺旋桨推进器以及用以供暖的热水管道系统。新式的螺旋桨推进器，还可收进船体内清理冰块。此外，两只船上装载的食品有：61987 公斤面粉，16749 公升饮料，4287 公斤巧克力，1069 公斤茶叶，8000 桶罐头，15100 公斤肉，11628 公升汤，546 公斤牛肉干以及 4037 公斤蔬菜。如此丰富的食品储备，足够 129 名船员食用 3 年。用装备如此精良的船只，打通西北通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北极探险，它的使命是从冰海打通驶往亚洲的海路。成千上万从英国各地赶来的人们云集在码头上，目送探险船徐徐起航，而威风凛凛的富兰克林叼着烟斗，挥舞着手杖说：“ 等我送来到达中国的消息。 ”

然而，已届 59 岁高龄的富兰克林船长，自打踏上征程，心情并不轻松。临行之前，他年轻的妻子简·富兰克林，为他赶制一面丝绸的英国国旗，好让他随身带上。见他身体微微发颤，以为他冷，便把旗子盖在他的腿上。不

料，富兰克林翻身跳起，急恼着大叫：“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把国旗盖在尸体上的吗？”尽管英国上上下下，对于此次重大探险的成功信心十足，可他心知肚明，此行的风险极大。早在 1819 年，他就曾指挥一条船，踏上探寻西北航道的漫长旅程。那一次，他进入哈德逊湾，并在位于北纬 57°的纳尔逊河河口登陆，接着又乘小船顺河而上，一直到达河的源头——温尼伯湖的最北部顶端。随后，他又与另外两个同伴冒着零下 45℃的严寒，徒步向西北挺进。一路上，他们接纳了一些当地人和法国人的混血后裔加入探险队，查勘了广大的地区。直到 3 年之后 1822 年夏季，才返回纳尔逊要塞。可此时，全队 23 人，已有 18 人因病饿等原因，悲惨地死去。1825 年，富兰克林又进行了第二次北极探险。这一回，他的船队，从加拿大西北部的大熊湖出发，考察了楚科奇海至科珀曼河河口的美洲北部海岸线，也就是西北航道的下游。在长达几十年的探险生涯中，富兰克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当然更清楚，北极冰海，危机四伏，稍有不慎，便会有去无回。本来，领受任务之前，他刚从作了 7 年培斯马尼亚总督的任上回到伦敦，有娇妻和幼小的女儿相伴，按理说应该安度晚年了。可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比调查美洲北部海岸和打通西北航线更重要的了。明明知道路途艰险，可他仍然坚决要求担负此任。

富兰克林把“恐怖”号留在比奇岛附近，自己带着“阴阳界”号北驶。可在北纬 77°处遇到了坚冰。于是调转船头南下，绕孔沃利斯岛一周，冬天来临前回到了比奇岛。在第一个漫长的冬夜里，有 3 名队员死去。

向北的路不通。第二年夏天海上冰融后，船队向南挺进，继续寻找西北通道。可不出两个月，1846 年 9 月 12 日，船又被冻结在北纬 70°附近的海面上，这儿离威廉王岛北端不过数公里。冬天很快来到了，更大的灾难也随之降临。令人恐怖的怪病，迅速在船员中漫延，夺去了一个又一个生命。1847 年 6 月 11 日，病入膏肓的富兰克林，终于撒手归天。

这一年夏天，“恐怖”号与“阴阳界”号，仍然未能驶出包围它们的坚冰。直至 1848 年春天，剩下的不到 100 人，终于决定弃船逃命。他们携带几艘小船，乘着雪橇，向南行进。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在威廉王岛上发现了他们遗弃的什物和装着骨骼的棺材。再往南，就只有一些零乱的骨骼了。这个探险队所有船员的足迹，都留在了北美大陆上，进入到他们所乘之船早已给他们指明的境界。

英国国内许许多多关注这次探险的人们，3 年之后仍然没有得到一点儿有关富兰克林及随员的消息时，一共有 40 只队伍，从海上及陆地，进入加拿大北部星罗棋布的岛群之间，搜寻富兰克林的下落。待他们把只鳞片爪的发现汇聚一起，终于知晓了这次悲剧的全貌。

人们对于富兰克林及其船员们的死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大惑不解。开始推测他们均因患坏血病而死去，可是，这似乎又有些说不通。因为船上大量营养丰富的食品，是不会令这些身强力壮的皇家海军军人生此疾病的。1984 年和 1986 年，加拿大的一个科学调查小组，来到比奇岛上，对 3 个坟墓开棺验尸，以查清遇难者的死因。当他们打开一个个棺盖，不禁惊得目瞪口呆。虽然时光已经淌过了 138 年，可几具尸体完好如初。这几个过早去世的青年人，个个张嘴睁目，好像是在拚命地呼吸，不忍别离。待全部化验结果出来以后，富兰克林探险队的死因又有了新的解释：在他们的头发里，铅的含量，竟比正常值高一二十倍！严重的铅中毒，不仅可以损坏人的健康，还会破坏人的神经中枢，使人的性情狂乱，失去控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

么这几具死尸，手脚均被紧紧捆在一起。

是什么原因，导致船员铅中毒的呢？原来，当时船上带的大量罐头，是用铅和锡的合金作为密封的焊料。这种焊料中铅的含量高达 90%以上，它们会向食品中渗透，致使食用者中毒。此外，由于这种焊料流动性差，会留下许多缝隙，从而导致食物腐烂变质。这两个结果，对于探险队来说，都是致命的。

深入北极心脏第一人

当 1879 年美国“珍妮特”号在冰海折戟沉舟，德朗死于陌地的时候，一名奥斯陆大学的学生正在写他的毕业论文；而在 1884 年美国格里利被冰原所围困，探险队的残兵剩勇劫后余生的时候，这位大学毕业生已当上了卑尔根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

他就是佛里多约夫·南森——古老的北欧海盗的一位杰出后代，挪威人，1861 年出生在奥斯陆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南森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北极探险家。他的探险活动与其他人不同，不怀任何商业及功利性目的，始终把着眼点放在科学研究方面。

在 1893 年正式踏上去北极点的征程之前，他曾到格陵兰进行过一次徒步穿越全岛的长途旅行。他先乘船到该岛的东岸，然后乘雪橇向格陵兰西岸前进。整整一年，他爬冰卧雪，风餐露宿，忍受着严寒酷冷，终于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用雪橇横穿格陵兰的人。格陵兰之行使他得到了一个切实的体验：若想北极探险成功，必须自立自足，不应等待外部的援助。

他从格陵兰归国之后，立即着手拟定北极探险的计划。他很高兴他具备了在他以前探险家所不具备的许多知识，尤其是“第一次国际地球极地年”提供给他许多有关水文气象方面的数据。他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了信心。

正在这时，一条并不醒目的新闻吸引了他：人们在格陵兰东部海区捞上了一条船的残骸，经鉴定，它正是 5 年前在西伯利亚东海岸被浮冰挤碎的“珍妮特”号。南森兴奋异常，他认为，既然在东方遇难的船若干年后会在西方见到它的碎片，那么说明北极的冰层下面一定有一股海流。他联想到在格陵兰之行中的发现：当地人总是到海边捞取巨大的漂木作为建造船和雪橇的材料。这些漂木经一位植物学家鉴定，它们大都是西伯利亚的落叶松。他在格陵兰的另一个发现是：在海边流动的漂木中有不少是木片，这些木片属于爱斯基摩人射鸟武器的一部分，与格陵兰人使用的木片不一样，完全是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的产品，上面嵌着那一带地区特有的石块。

南森激动不已，他作了个大胆的设想：北极区存在一股由东向西的海流，而这海流很可能会经过北极点，他一直幻想着征服北极点，现在简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达到，只需把自己冻在某块浮冰上，然后由海流把他送到目的地。

南森的计划已经明确了：先乘船到西伯利亚海区，即“珍妮特”号遇难的地点；接着让船与浮冰冻结在一块儿，随着海流漂过北极，到达格陵兰东部海区。

当时，破冰船还未问世，如何设计一条适宜在冰海世界中航行的探险船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此，南森苦心钻研，设法使船体能经受巨大的压力，而形状却像瓜子壳一样，当冰层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船就被挤到冰块上

面；而当压力减少时，船又可下降到水中。他把自己设计并制作的船命名为“先锋”号，乘员 12 名，可装载足够 5 年用的燃料和食品。

1892 年， 南森兴致勃勃地把他的计划在伦敦的地理学年会上宣读，立即遭到了他人意想不到的嘲笑。一位有 20 多年极地探险经验的老探险家指着南森说：“你疯啦。我敢说你在那里度不了一个冬天。如果你执意孤行，我将永远见不到活着回来的你了。”另一位著名的探险家也说：“风向是决定浮冰漂流方向的主要因素，你这是异想天开。”南森并没作补充答辩，便急匆匆回到挪威。

1893 年 6 月 24 日，“先锋”号从奥斯陆扬帆起航。船上有南森、船长奥托·斯菲尔德及其他 10 名经过精心挑选的队员。“先锋”号绕过挪威北端，向东西伯利亚海驶去。他们来到了勒拿河口的哈巴罗夫村。南森在这里买了 35 条拉雪橇的狗。8 月 4 日，他们驶离了这个寂静的极地村庄向着喀拉海北进。

纷至沓来的浮冰包围了“先锋”号，但它并未被冻住，继续向北方艰难地行驶，直到北纬 78°30′的地方船才停住。这里距北极点还有 1300 公里的路程。这时，漫长的极夜已经开始，气温也急剧下降。南森已经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满眼是漫漫风雪，茫茫暗夜，而耳边却是大自然的鬼哭狼嚎。每天晚餐，他们围坐在船舱里，喝酒谈笑、烤鹿肉，生活得好象称心如意，其实每个人都惶恐不安，生怕“先锋”号会遭到与“珍妮特”号一样的命运，被冰挤扁。

一个黯淡的夜晚，正在进餐的他们突然听到冰裂的巨大响声，响声一阵又一阵，隆隆不绝。他们都站着，静候着即将分晓的命运。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体随着船体升高，最后凝然不动。他们跑上甲板，船已经被冰层抬起，稳稳地停在坚冰之上。南森悬挂着的心终于安然落下了。他当初的设计完全正确！现在“先锋”号已与冰固结在一起。他们现在所需做的，是熬住单调日子的孤寂，让海流把他们带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但是单调却是十分难耐的，以致本来非常活跃的南森也禁不住在日记上发泄他的苦闷：“真希望恢复有生气的生活。每天都静止不动，真的会把人的灵魂给淹没。单调的日子就像冬夜一样死寂，我必须设法打破这种苦涩而充满惰性的气氛……有时我盼望来一阵暴风，把四周的冰全都撕开，而在船的周围出现再没有冰的大波大浪。这盼望常常进入我的梦境……”

幸好，南森绝不是为探险而探险的探险家，他有他的科学事业。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之中，科学始终忠实陪伴着他。他们随时随地观察风云变幻，测气温冰温，判别冰块的漂流方向。

南林终于断定：冰和船的漂流方向和风的方向并不一致，而是总和风向呈 20°～40°偏角向右漂流，因此，这里确实存在着一条海流！他欣喜若狂，因为他有可能向北漂到北极点。但是遗憾和失望接踵而至：“先锋”号到了北纬 84°后，再也不移动半寸。虽然他们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记录——至此为止，还没有一条船能到达这么高的纬度。但是创记录不是他们主要的兴奋点。他们需要的是到达北极点，在北极点作科学考察。

南森肯定“先锋”号不会再向北漂流了。他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从这里到北极点只有 600 公里，坐雪橇仅需 50 天便能打个来回，由他和约翰逊来走完这个最后的路程。

1895 年 3 月 14 日，船长斯菲尔德带着留守的人站在船边，目送南森和

约翰逊远去。他们的眼里都噙着热泪，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的频频挥手，是意味着生离还是死别？

起初的两三天，南森的行进不算顺利。27 条狗拉着 3 架雪橇，雪橇上载着两只小船和他俩，飞速向北极点挺进。但不久，困难就层出不穷：首先是道路的高低不平，到处都是冰缝冰裂，要不就是冰丘冰凌。有一次，当他寻思如何过一条深深的冰渊时，约翰逊不慎滑倒，掉进一个冰洞。南森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他救了上来。他们终于到达北纬 86°14′的位置，距离北极点只有 418 公里，但是他们再也无力向前跋涉了。南森在日记里记着：“凌晨两点，温度降到—23.9℃，冰的情况愈来愈恶劣……由冰块堆积得凹凸不平的冰原无限地伸展，要越过它，非得把雪橇抬起来。如此艰难的行程，就是再比我强壮 10 倍的人也受不了……”

不过南森并没有放弃再作进一步的努力，他们继续走了两天才停住了脚步。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掉头往南，到附近的法兰士约瑟夫群岛去。但他们实在太累了，睡了一个深深的长觉之后，他们看到腕上的手表都停了，原来他们都忘了给表上发条。这个疏忽使他们的返程更为困难，使得他们不知道正确的时间，也无法计算自己所处的正确位置；由于他们又很接近北磁极，指南针几乎失去作用，所以根本到不了距离不足 100 公里的法兰士约瑟夫群岛。

他们在冰原上东逛西荡，找不到任何头绪，作了不少最终是枉费心机的努力。渐渐地，北极的春天来了，薄薄的冰上出现了麻脸般的小水塘，海中的冰也消失了，人、狗、雪橇都得靠艇来渡航。食物逐渐缺乏，饥饿的狗开始啃食任何能吃的东西，有一次，甚至把睡着的约翰逊的皮靴啃出一个大洞。南森只好把衰弱的狗杀死，将它们的肉给其他狗当食物。

5 月 15 日，约翰逊有点神情恍惚。但南森不动声色，到了晚间，他突然掏出一瓶酒，然后举杯祝贺约翰逊 28 岁的生日，同时用嘶哑的嗓子唱起《祝你生日快乐》。约翰逊为此感动得大哭起来。他没想到南森在这样困苦的场合还没忘记他的生日，也没想到他会藏着这最后一瓶酒。

到了 6 月 9 日，还在到处乱闯的他们，食品彻底吃完。南森只留下了 3 条最强壮的狗，其余的一概杀掉做成肉干。接着天气也开始折磨这两个疲惫已极的人，大风带着雨夹雪漫天遍野袭来。南森的腰疼病又犯了，于是他们停下来休息。几天之后，他们明知道继续行走也是白费精力，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迈动沉重的脚步。

夏天确确实实地到了。一天，约翰逊突然看到冰上有一只海豹，他不由分说就扑了上去，用牙咬，用刀子扎，杀死了它。他们止不住发狂地大笑，多少天来没见过成堆的鲜肉了。

8 月 7 日，他们进入蔚蓝的海域。他们把两艘小艇连结在一起，撑起一面破帆，开始海上航行。过了些日子，也就是离开“先锋”号的 122 天之后，他们看到了远处有一个岛屿。这天正好是万里晴空，海上刮的是微微的顺风，没多久，他们便登上了岸。

这是法兰士约瑟夫群岛最北端的一个小岛。快进入 9 月，夏天即将过去，要想回到“先锋”号是不可能的了，他们得寻找合适的地点，准备越冬。

他们在岛上转了一圈，在一个附近有绝壁的地方建造营地。绝壁挺高，可以挡风，也可以抵御自然的侵袭。周围有许多海鸥，而海豹、海象和鱼类也随处可见，那儿确是一个不乏新鲜肉食的最佳驻扎场所。

他们的营地其实只是个洞穴，无非在洞穴之上覆了几层厚厚的海象皮。为了防水和防风，所有有缝隙的地方都用石块和苔藓来塞住。他们在洞穴里过了第三个可怕的冬天。他们每天轮流到外面去寻找食物，另一个负责留守修理洞穴。

7 个月后，即 1896 年 5 月 19 日，他们把小船拖入已经融化的大海，奋力向南划去。接着的两三个星期，数不清的灾难接连不止。与浮冰周旋还算是小事，海面上经常冒出一些被漫长的寒冬饿慌的海兽，把他们当成了猎物。有一次，一头海象在他们还未反应过来时，便用大嘴撕走了船边的一块木板，冰凉的海水立刻涌了进来。这时幸好有块浮冰在附近，他们划到那里把漏洞补好。几天后，他们在一个岛屿上登陆。

这是他们第二次登上陆地，兴奋之情可想而知。但是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他们没把船绑好，船开始漂动了。约翰逊手足无措，只是发疯般地大叫。南森立刻脱掉衣服，跳进临近冰点的海水里。他的举动是以生命救生命——因为小船里有他们全部的生存资源，而身上却连一把小刀也没有，失去小船就等于失去生命。

南森真是命不该绝。他抓住了小船，跳了上去，并把船划了回来。

他们登上的是一个大岛。休息了几天，准备向南跋涉。6 月 16 日，正当他们在收拾行装的时候，一群海象从海边扑了上来。他们只来得及抢出最必需的东西，眼巴巴看着海象群把他们的小舟撕啃得粉碎。

第二天，他们进入了岛的内地。一夜的深睡使他们醒来时依旧晕晕乎乎。这时南森听到了一声狗叫，他以为是幻觉。接着他又听到一声狗叫，远远的，却还清晰。南森慢慢站了起来，他们最后的两条狗早在一个月前就杀掉了。怎么现在还有狗声？南森痴呆了半响，这才恍然大悟：附近有人！对，有狗就有人！

“啊，我听到了人的叫声！”3 年间，南森第一次听到这么熟悉的声音，他和约翰逊立刻抛下手中的东西，喘着气跑向冰丘的上头，这时的心脏激动得快要胀裂，头上的血液似乎也要沸腾了。接着他们在遥远的冰原中间，看到黑影在移动。

“那是一个人！”南森一边跑，一边挥动帽子。那人也一样，也不停地挥动帽子。

他们跑近了，这才确实听到了人类的声音，那人说的是英语。原来，那人是英国的探险家杰克逊。过了很久，南森才确信自己获救了。两人打招呼的情景十分感人，彼此都以为他们的相逢是在梦境。

一个月后，“维因多瓦”号便出现在他们的岛边，这船是来接杰克逊回国的。1896 年 8 月 13 日，南森踏上了他离别 3 年的故土。

他的归国引起了挪威全国的轰动。但南森并未沉浸在他生还的喜悦中，他更关心“先锋”号的命运。7 天之后的 8 月 20 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使他差点晕倒：斯菲尔德船长的“先锋”号已在挪威的特罗姆瑟港靠岸，探险队员全都无恙归来。

原来，“先锋”号一直在冰上等待着南森。但它缺少机动能力，只能随冰飘浮。该船曾于 1895 年 11 月 15 日到达北纬 85°55′，出现于北极海域的大西洋一边，那里距北极点仅 454 公里。后来，“先锋”号折向南方，朝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漂流，最后在该群岛北部用炸药破冰而出。

南森成了深入北极心脏地区的第一人，多次的探测表明，北冰洋里并没

有大的陆地，而是一个深深的海盆，而且越往北水越深，至少深达 3700 米。南森也是第一个验证北冰洋存在着由东向西流动的极地海流的人。

南森的探险队在北极圈内漂流了 3 年多，行程 2000 余公里，广泛进行水深和水温测量，收集到大量的海洋物理环境的数据，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有关北极的知识。

一个杰出的人物凭着他的想象力和科学知识，组织并完成了伟大的北极探险。那艘功勋昭著的“先锋”号，至今还陈列在奥斯陆的博物馆里。

南森，这个北欧海盗的后代，他的业绩远远超过他的那些强悍的老祖宗。

业余探险家的征服

1909 年，人类第一次在北极点留下征服者的足迹。率领那支征服队伍的是一名普通的美国海军军官——罗伯特·皮尔里。

时间又过了 70 年，1978 年 1 月 30 日，植村直己从日本羽田机场飞往温哥华，于 2 月下旬到达加拿大埃尔斯米尔岛最北端的“极光基地”。他要从这里独自一人开始征服北极的行程。

37 岁的植村直己也许算不上一个纯正意义上的业余极地探险家，因为在此之前他曾攀登过北美、南美和非洲的最高峰，也曾乘坐木筏在亚马孙河上漂流 6000 公里，他甚至还随第一支日本登山队登上过珠穆朗玛峰。他也有在极地旅行的记录：从格陵兰到阿拉斯加，乘雪橇走了 1.2 万公里。但是他仍在一家公司供职，等赚了些钱就出去探险，钱用完了再回去上班。

3 月 5 日，天空晴朗如洗。植村直己早早就起了床，他赶到哥伦比亚角，这里为西经 71°8′、北纬 83°6′。下午 3 时，他乘上雪橇，由 17 条爱斯基摩狗拉着，向 766 公里外的目的地奔去。

最初的几天，由于乱冰横生，他走得并不顺利。3 月 9 日凌晨，他刚躺下睡觉，就听到帐篷外一片狗叫，接着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和粗大的喘气声。他毛骨悚然，知道来了北极白熊，但他不敢动弹，来福枪虽然伸手可及，但根本没装子弹，再说出发后也没校过准星。

白熊在外面撕咬狗食箱子和鲸油桶。它吃饱后没有即刻离去，反而转向帐篷，用利爪撕扯，植村直己紧张得屏住了呼吸。幸好，白熊拱了一阵就转身走了。他立即爬出睡袋，拿起枪，向已到百米开外的白熊开了一枪，白熊没被打中，跳入海水中逃走了。

第二天他没行走。傍晚，正当他在熬咖啡的时候，狗又叫了起来。他拿着枪冲出帐篷。果真还是那家伙，它熟门熟路地走向雪橇。植村直己的第一枪便把它打拐了，第二枪则要了它的命。

植村直己用熊肉喂他的狗，又储备些熊肉，作为昨晚损失的补偿。

北极开始显起了神威，狂风大作，有时他一天只能前进几百米。他的下巴和鼻子都冻伤了，手也经常失去知觉。狗的情况也不妙，由于春天的发情，它们为争夺雌狗而相互撕咬，弄得鲜血淋漓。

到了 3 月 16 日，又出现新的问题，横在他前面的是一条约 50 米宽的水道，他等了整整一天，水道合拢成 1 米。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吆喝着狗队飞速前进，雪橇跃过去了，但有 5 条狗落进了海里，后来虽然它们全被救了上来，但时间又多费了一天。

直到 3 月 26 日，路途才顺利些。不过乱冰块没有了，雪却积得很厚，狗

在软绵绵的雪里，一蹶一蹭，怎么也跑不快。植村直己只得延长跋涉时间。狗累了干脆躺倒不干，他也只好就地宿营。由于他困乏过度，一觉醒来，往往睡过了时间，速度并不见得更快。

4 月 1 日，飞机对他进行了一次补给，替换了两条冻伤的狗。他获得了新的力量，咬牙继续往北走。他突然看到一条名叫“雪罗”的狗走路一腆一腆的，仔细观察才发现它怀孕了。于是他免掉了它的劳役，让它跟着雪橇慢慢走。4 月 9 日夜，雪罗开始分娩了，植村直己在旁边帮助它。不一会儿，雪罗先生下了一对小狗，但还未等他清醒过来，这一对小狗就被其他饿慌的狗吞食了——每天的配食定量，使狗总是吃不饱，它们往往连雪橇的牛皮套筒都啃得千疮百孔。他只好把雪罗抱进帐篷，这下它又顺利地产下 4 条连滚带爬的小狗。第二天，他刚要出发，雪罗眼泪汪汪地望着他，又产下了 3 条小狗，为此植村直己又耽误了一天。

他的雪橇上现在有了新的伙伴，那就是被他裹在鹿皮里的 7 条小狗。虽然这样有些累赘，但新的生命也给他增添了不少乐趣。4 月 14 日，补给飞机第二次来到他的身旁，给他送来了 4 条健壮的狗，载走了雪罗和它的小狗。此时，他在 40 天里走了 400 公里的路程。他望望天，觉得自己信心倍增，只要天气照常，只需突击 10 天，他就能到达北极点。

但是他未免估计得过于乐观。首先的问题是新来的强壮的狗不听使唤，它们与植村直己不熟悉，因此不明白他的意图，往往东南西北乱跑一气。待他稍为娴熟地能驾驭这些狗时，又碰到了一件极为惊险的事。那天，他将浮冰划渡一条 10 米宽的水道，哪知浮冰太薄，载重量不大，他刚将全部物品集中在一头，浮冰突然后倾，雪橇“刷”地一下向倾斜的一头滑去。植村直己眼看连人带狗全要被雪橇拖入海中，就猛地向前一跃，同时用力敲打挽绳。狗好像也觉察出什么危险，就罕见地同心协力向冰岸上跳去。雪橇被拖上了岸，而他却被吓得浑身冷汗。

以后的几天他又遇到了狂风，再加上浑然不见景物的雪暴，使他钻在帐篷里不敢外出。他的狗一向是宿在雪地上的，这次也全都躺进帐篷一动不动。他知道这些狗都很饿，它们蓝幽幽的眼睛盯得他止不住发颤，所以他一直手不离枪，也不敢睡觉。

4 月 18 日，植村直己总算向前走了约 20 公里。这天，他刚扎下营地就听到不远处一声巨响，一条巨大的裂缝几乎要把他的帐篷撕成两半。他立刻拨出橛子跳到另一块浮冰上去。等他清醒过来，方才大吃一惊，原来他跳上的这块浮冰正向一片海域漂去。他用滑雪杖当桨使，这显然是无济于事的。正在他急得满头大汗时，海中奇迹般地出现了一群逆戟鲸。它们被这浮冰上的狗和人吸引住了，老把头露出来想啃食，由于它们的用力在同一个方向，居然把浮冰推向了冰岸。这是天赐的良机，也是他唯一逃生的途径，就在浮冰和冰岸相撞的一瞬间，他大声训斥狗。其实根本不用他吆喝，狗也被逆戟鲸吓坏了，它们猛地拖着雪橇，跑上了冰岸。

在这之后，虽然他还遇到了几次障碍，但大多是有惊无险。4 月 26 日，飞机给他作了最后一次补给品空投。这时他离北极点只有 100 公里的距离了，最后的冲刺便开始了。

到了 4 月 29 日的晚上，兴奋的植村直己难以入睡。他一次次测定自己的方位，总不相信自己已经面临着成功。那天夜里，他几乎没合眼。第二天清早，他就驱狗开路。最后的 12 个小时顺利得简直出乎意料，狗在平坦的冰面

上飞速地跑，坐在雪橇上的他好像在进行一次愉快而平稳的郊游。在格林威治时间下午 6 点 30 分， 他停了下来，开始作方位的测定。

他镇定地搭好了帐篷，然后从容不迫地每隔 3 个小时测定一次，他一共测定了 8 次。最后他小心翼翼地从雪橇上取出国旗，极其郑重地插在北极点上。

这是日本国旗第一次在北极点飘扬，它是由一个业余探险家插上去的。在这旗的下面，有一块铜牌，上面镂刻着一串长长的姓名——他们赞助他进行单独的探险，这些人大都与他素昧平生。

中国北极科考队

1995 年春，中国首支北极科学考察队在凛然无际的广褒冰盖上，留下了炎黄子孙的第一行脚印，为人类探知北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面是人民日报社记者孙晓宁随队采访的记叙：

北京时间 1995 年 5 月 6 日凌晨，东半球的北京，正是夜深人静。而在地球另一边北极圈内的加拿大雷索柳特机场，一群身着红绿两色羽绒服的中国人，疾步走出一家机场旅馆，向着远处一架嗡嗡作响的小型飞机奔去。他们羽绒服左袖均缝制了一个圆形标志，其正中为北极地形图案，边上一圈书着小字：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

虽然当地此时已届仲春，四周却依然雪锁冰封。一股刺骨的凛冽北风迎面袭来，人们满身顿时凸起鸡皮疙瘩，接着忍不住又打起了寒噤。大家急忙低下头，弓起腰，紧闭嘴，继续前行。耳边除了风啸啸，就只有脚踩雪地后发出的“ 嘎吱、嘎吱 ”的声音。

零时 20 分，他们乘坐的这架只有 16 个座位的“ 双水塔 ”式小型客机，与另外两架空机在跑道上轰然而起，朝着北极点方向，疾驶而去。

上午 8 时，第四架主要承载着一批新闻记者的飞机，螺旋桨又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响。随后，机轮与安装在轮子周围的滑雪板，在积了一层冰雪的跑道上由慢渐快滑行几百米，猛地昂头朝上，直刺蓝天。

天随人愿。今天，老天爷扫去了漫天大雾，收住了肆虐的风雪，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全部 25 名队员在极点相聚的计划，眼看可以实现。

尽管早在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即已发明了指南针，找准了北极的准确位置。然而，几十个世纪过去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除了顺着指南针指明的目标，冲着寒流袭来的方向，不时眺望几眼外，再极少有人动动念头，迈动双脚，去实地领略一番极地的奇特风光。直到 1992 年，才有一位香港奇女子李乐诗，搭乘加拿大飞机，降落在北极点附近，拍摄了一些冰雪奇景，算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北极点留下了足迹。眼下，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一分为二：13 天前抵达北纬 88 ° 冰盖，并由此开始徒步考察的 7 名冰上队员，已经迫近极点；其余驻雷索柳特基地的科考队员与新闻记者，分乘两架飞机，正向极点进发。如此之多的中国人汇聚北极点，称得上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一件盛事。

飞机开始掠过加拿大北部星罗棋布的岛屿和曲曲弯弯的海峡。机舱里的人们，尽量地贴近舷窗，睁大双眼，饱览身下缓缓后退的白色冰川。

地球顶端的群岛，与其他地方的岛屿并无二致，也是山峦起伏，河川密布。可不同的是，山上不见一草一木。它们银妆素裹，仪态万千，像一尊尊

娇娆多姿的冰雕。在有些危岩壁立的山崖和尖尖的山峰上，黑色的石头显现了出来，与四周白雪形成鲜明反差。远远望去，黑白两种色块，浓淡相宜，再加上妙然天成的条条曲线，分明就是一幅幅绝好的水墨丹青。

一些山脊，被风吹得露出了褐色的岩石，尤如放置在白色的桌布上的一方方砚台。有的“砚台”盖，像是画上了横横竖竖的白线，形同龟背。飞机几次降落加油，我们才看清，这些白线处，均为起码 1 米多宽的裂缝。雪夹缝中，因此现白。坚硬的磐石，为何而裂？是狂风撕扯的结果？抑或极度低温冷冻所致？毫不疑问，它们是亿万年来北极地区残酷自然力量不断摧折大地的见证。

透过袅袅薄雾远眺，一条条河流，似乎都在奔腾着，欢跳着。定睛近看，却是死一般地沉寂。河上的冰雪，把河水封冻前的流姿凝固保存了下来，极易造成人的错觉。当地气象资料表明，加拿大北部岛屿地区一年中有 10 个月以上是冰天雪地，只有很短时光，雪化冰融，水泻千里。

“你们看，那线条多像长城！”同机的一位队员，指着广阔得尤如一马平川的海峡，突然大声嚷起来。果然，那些神秘的线条，呈横、竖、折几种“笔画”，井然有序，凸凹均匀，酷似长城轮廓。它们无疑是冰块间相互挤压后形成的。然而，冰与冰之间的胡推乱搡，为何能够得出如此井然有序的结果？这难道不就是北极大自然给我们这些来自华夏大地的远方来客备下的一份特殊的见面礼？

飞机降落在位于北纬 80°的尤里卡供应站加油，随后昂头北上，划入茫茫无涯的北极冰盖。

金色的阳光，把雪白的冰盖染成一片桔黄，也把飞机的小影子印在了冰雪之上。随着影子的移动，我们一点点接近这个与中国版图几乎一样大小的冰盖的中心。飞机不时降低高度，贴近冰面行进。我们发现，广阔无垠的冰面上，横横竖竖，鼓着一道道冰脊。远远望去，冰面与冰脊，好似桑田与土埂。还有一条条黑色的“河流”，这儿淌一条，那儿流一道，这就是北冰洋上特有的冰裂缝。有的裂缝，宽达数千米，长绵几十公里。被洁白的浮雪衬托得黑如墨汁的海水，舒展地在“冰河”里流淌欢歌……

沧海桑田——眼前的情景，使我们脑海里自然而然蹦出这个词汇。一种沉甸甸的历史纵深感，也从我们内心涌出。

我们身下的这颗星球，其形成大概可以追溯到 46 亿年以前。混沌初开之时，新生的地球上，因火热的岩浆分解出还原成分的气体，形成了大气层。由此产生的原始生命，通过生物地球化学作用，又使大气渐渐变成氧化型，生命便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

古往今来，地球上陆地分分合合，海洋消消长长，气温升升降降，生命生生灭灭。人类社会也随大自然的变化而不断变迁，不断地发展进步。人类自从来到这个世上，在领受大自然无穷无尽恩赐的同时，也无时无刻地在巧妙地改造着自己的生存空间，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布置着这颗星球的一切。可是，时至今日，地球上仍有部分角落，人类力量难以伸及。我们身下的这块地球北部边疆便是如此。它那死一般的沉静，无休无止的冷僻，无不显示着地球亘古蛮荒的原始状态。

人们不能不感叹，当地球上绿色力量蓬勃生长，不断进化进步人类，又创造出一个工业革命的强大黑色力量，并且使之飞快壮大、走向极致之时，亘古不变的白色力量，却还在这世界的角落里肆意横行。

征服这股白色力量，是人类充分显示自己世界主宰地位的用武之地。因此千百年来，会有那么多的探险家，不畏牺牲，前赴后继，在白色荒漠上，留下了难以抹灭的足迹。尤其到现代，当人类逐渐知晓，白色力量对于全球绿色力量与黑色力量具有相当大的震慑力与控制力时，就更不能忽视它的存在。科学家们于是纷纷进入这一地区，探索白色力量的来龙去脉，寻找驾驭这股力量的诀窍。

文明人类向北极进军的行列中，中国人已属跚跚来迟者。在过去太长的时间里，我们只顾扫却“门前雪”，而把这块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大地，当成了无需关心的“瓦上霜”。今天，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也把自己的极地科学家，第一次送上了地球之巅……

“冰上队员已经抵达北极点！”加拿大飞行员把刚刚收到的消息传到后舱，我们的思绪，于是又被拉回到这方移动的小天地里来。机舱里响起一片掌声，大家都企盼着飞机加快速度，尽快抵达极点。

“前面一架飞机出了故障，必须返回基地检修！”下午 2 时许，一个坏消息又通过电波传到最后一架记者包机，大家的心不禁一阵紧缩。大家知晓，那架飞机里，坐着 8 名队员，走上北极点，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宿愿。离极点仅剩一个多小时航程，一个历史性的良机，眼看着与他们失之交臂。

下午 3 时 10 分，冰面上一群黑点印入机上人员的眼帘。10 分钟后，飞机在凸凹不平的冰面上“呼呼”蹦跳滑行一段，终于在雪地上插着的一面五星红旗附近停止了行进。

舷梯刚放好，机上队员一个接着一个飞奔下去。散在四处的冰上队员也吼叫着狂奔过来。身着各色羽绒服的双方队员们，相向跑近，没待看对方面孔，便伸一双臂，热烈地拥抱成一团。有的队员跳起来扑向对方，不料落下来时，脚陷进松软的雪地里，身子接着摇晃歪倒，又把对方一同拽倒在雪地上。红色与红色，红色与蓝色，蓝色与黄色，各种色彩搅和在一块儿，把个纯白的雪地，闹得热气腾腾。

五星红旗的落脚处，便是队员们确定的北极点，飞机在此附近可以停留 1 个多小时，乘此机会，我们可以好好审视一番这个具有特殊地理意义的地点。

这个被称作“地球顶巅”的地方，与冰盖别处似乎完全相同。雪，同样的白；冰，一样的蓝；空气，照样的冷。而且也看不出是“巅”。因为它根本就不比周围高。不过，它的地理内涵，却是如此丰富。

就是这个小小的点，犹如一只魔手，可把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经线，玩弄于股掌之中。经线是时间分区的依据，在这儿，没有了经线的分割，也就丧失了时间的区别。若在极点放置一张乒乓球桌，举行一场友谊比赛。那只小小的银球，可说是一会儿从昨天飞到今天，一会儿又从今天返回昨天。记者手持秒表，围绕旗杆疾跑一周，捏表一看，完成此次“环球旅行”，只用了 3 秒钟！

这儿只有一个方向，举目四望，都是朝南。记者掏出随身带来的今人仿制的中国最早指南针——司南，只见那具原本总是朝南的勺柄，此时你把它放在任何方位上，它不仅不再会自己转动，而且颓然倒下。

地理学意义上的北极点，既看不见，又摸不着。这只能用仪器才能测出来。今天以旗杆标志的极点，即为中国科考队员使用先进的 GPS 定位仪，通过接收多颗美国通讯卫星的信息，最后计算得出的。本来，这个系统的精确

度为 8 米，也就是说误差不超过 8 米。可美国有关当局将这一系统由军用推广至民间后，担心它会给美国的安全招致祸患，于是耍了点小手段，把误差扩大至 60 米。不过，即便有了点儿误差，我们现在仍然十分接近于北半球地轴的所在地。

立足极点，举目四眺，冰盖广阔无边。四周除了白色，还是白色，辽远而空灵。此刻，我们的感觉，比第一次身置大海之滨还要痛快，整个儿心胸，无比开阔，无比舒畅。置身于这个纯净广袤的世界中，我们突然领悟：过去我们生活中触及的那些烦恼，那些愁闷，那些名利，那些荣华，都是那么的漂渺，那么的灰暗，那么不值一提。现在，只有我们的脚印，与我们同在！

一阵阵寒风，夹着雪粒，吹打在我们暴露在外面的皮肤上，也把雪地吹出了一道道皱纹。目睹雪纹，你会很容易联想起那波动的春江和有序的树木年轮。不过，这个银色的世界里，绝对见不到生命的痕迹。四周荒凉空寂中，只因有了我们，才显出了一点儿生气。我们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宣告，此时此刻，只有我们，才是这银色荒漠的主宰。我们真想向这冰雪王国大喝一声：“北极点，我们中国人，来啦！”

一个已经筹备好的庄严仪式，因为部分队员未能抵达极点而成为泡影。站在极点的 16 名中国人，在雪地上排成几行，要把自己的身影与周围银白底色叠印在胶片上，作为永久的留念。大家面对着 1 万多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方向，展开了一面大幅的五星红旗，面容现出庄严与激奋的神情。这面红旗，是考察队员出发前，从天空门守旗战士手中接过来的。此时大家更掂出了它的份量。

一架架照相机，轮番操作，把所有在场的中国人一个不落地、清晰地收进底片：位梦华（国有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赵进平（中科院青岛海洋研究所）、李栓科（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刘少创（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效存德（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刘健（中国科学院）、毕福剑（中央电视台）、郑鸣（哈尔滨电视台）、卓培荣（新华社）、孔晓宁（人民日报社）、叶岩（中国青年报社）、刘刚（羊城晚报社）、孙覆海（青岛日报社）、王迈（中国建材报社）、王卓（中央电视台）、吴越（中央电视台）。

随时都在运动并且不断分崩离析着的冰盖，不是飞机的久留之地。几架“双水塔”上的螺旋桨，又开始旋转起来。桨上几条黑道，在高速旋转中，形成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句号。桨愈转愈快，句号愈“画”愈圆，愈变愈细，仿佛要摄去人的魂魄。厚厚积雪，被桨转动后形成的气流卷得纷纷扬扬，在人们眼前，形成了一片白雾……

告别了，北极点！

再见了，北极点！

飞机载着我们依依离去，我们对于北极点的无尽情思，却永远留在了那壮美的冰原之上……

征服珠穆朗玛峰

喜马拉雅山系

南极、北极，这是世人公认的两个人类的极限地域，不论是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及一系列的科学之谜，都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畏艰难险阻试图去接近它，征服它。而喜马拉雅山，以它那无以伦比的高大身姿、雄壮威武的气势，被人称为世界第三极。为了登上世界最高巅，人类同样做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留下了一串串无悔的攀登足迹。

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再也无法找出能与喜马拉雅相匹敌的山系。这里，耸立着数千座能与安第斯山脉、帕米尔高原相比的山峰；这里，更存在着比安第斯山和帕米尔高原高出千米的奇观。在喜马拉雅山麓，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峰竟然能找到 14 座。

喜马拉雅山系不仅在高度上压倒地球上的所有其他山峰，而且，它所盘踞的范围也大得惊人。喜马拉雅山脉雄踞中亚广阔的高地，绵延不断、重重叠叠的山峰，屹立在中国西藏、尼泊尔、不丹和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被喜马拉雅山所盘踞的国家和地区，其海拔高度均在 4500 米以上。因为受季风的影响，这些地方不断地遭受强风和冰雪的侵袭，境内的道路在一年之中除几个月外，大多数时间无法发挥作用。住在这个高地的农夫、牧人，由于交通上的困难很少与外界联系。

数千年来，有着独特的山地文化传统的喜马拉雅山区居民们，一直对屹立在他们周围的巨峰抱有崇高的敬意。他们认为，巨峰那高不可攀的气势和隔绝人迹的险峻，其本身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他们相信，这里的每一座山上，都居住着神灵。

“喜马拉雅”在梵文中的意思是“雪的故乡”。从东到西，它拥有长达 2500 公里的冰川与雪峰。陡峭山峰，万仞冰川，地面被深深切割，峡谷深不见底。直至今天，这个雄伟的山系仍在继续着造山运动，从而引起强烈的河流侵蚀和轰轰烈烈的大面积山崩。从南到北，它包括四条并行的山带：外喜马拉雅山、小喜马拉雅山、大喜马拉雅山、泰迪斯喜马拉雅山，其中，大喜马拉雅山是山系的骨干部分，耸立于永久雪线之上，拥有 9 座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峰。

世界最高峰

最早试图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 1919 年 3 月，英国的登山俱乐部组织人员向珠峰发起了挑战。但此后英国登山队向珠峰发动的 8 次冲锋，在整整 18 年的时间里，均告失败。但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其他地方，却传来许多登顶成功的消息：1930 年，英国登山队登上了约翰逊峰（海拔 7459 米）；1931 年，弗兰克·史密斯率领的英国登山队又登上了印度北部的克麦特峰（海拔 7756 米）；接着，高度在 6700 米以上的 9 座山峰，先后被由英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德国人和美国人所组成的远征队所征服。

尽管第二次大战阻断了英国人通向喜马拉雅山的路，但阻断不了英国登山家们的珠穆朗玛峰之梦。这座曾让英国远征队付出重大代价的世界第一高

峰，一直被英国登山界深情地称为“英国人的山”。

1950 年，法国人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 8000 米以上的高峰登顶成功的辉煌纪录（安那普鲁峰，海拔 8091 米），使得英国登山家们再也按捺不住了。第二年，英国登山俱乐部就组成了由军事家、登山家伊力克·希普顿为首的远征队，再次开拔到喜马拉雅地区。

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西藏已和平解放。为了保卫边境，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规定，任何外国人不经中国政府批准，都不得进入中国境内登山。在这之前的 1947 年，尼泊尔当局则宣布对外国人开放边境。这样，希普顿的远征队开辟了一条新的珠穆朗玛攀登路线——尼泊尔境内的南坡路线。

希普顿凭借他丰富的军事侦察经验，查清了一条由南坡脚下通向顶峰的路线。这条路线必须先经过大片的孔布冰川，再从这座山峰的西面往上攀登。在孔布冰川的上方有一段非常危险的冰瀑区，从冰瀑区往上是很深的龟裂口，再往上去，就是被称为维司坦克姆的狭长冰盆地。这是个长而狭窄的冰谷，沿着冰谷向上攀登，是征服珠穆朗玛峰最适合的路线。在这个冰谷的前面，是把珠穆朗玛峰与其他姐妹峰连接起来的长长的山脊。山脊的中央，就是被称作南坳的鞍部。登上南坳之后，是直达山顶的东南山脊。

在英国人完成对南坡的第一次勘察后，登山强国瑞士马上组成一支登山队伍，计划由南坡经南坳的这条路线，抢在英国人前面征服珠穆朗玛峰。

1952 年的春天，由狄特玛尔率领的瑞士登山家们，在雪巴族杰出的攀登者丹增·诺尔盖的引导下，越过南坳，到达了海拔 8540 米处。这次行动，使他们清楚地探勘到从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具体路线。如果赶上两个好天气，他们就很有可能登顶成功。但是，他们并不走运，坏天气使得他们功败垂成。瑞士登山队当时带着氧气，但他们未能很好地控制氧气的流量，致使氧气过早地用尽而丧失了与暴风雪抗争的能力。

隔了不到半年，1952 年 10 月，瑞士人第二次远征珠穆朗玛峰。这一次他们还是没有交上好运,肆虐的暴风雪又一次把他们从海拔 8100 米的高处击退下去。

瑞士人抢在英国人前面拿下珠穆朗玛峰的愿望落空了，但是，他们为以后的挑战者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资料。

1953 年，英国登山俱乐部又一次派出珠穆朗玛峰远征队。

这是英国人的“背水一战”，因为雄心勃勃的瑞士人和法国人宣布他们都已组成了强大的登山队，准备在 1954 年和 1955 年征服世界最高峰。英国人能否夺得地球之巅的初登胜利，全看这一次的努力了。

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英国登山队在装备和人员配备方面都作了极其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他们选择登山预备队员，在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技术和身体训练之后，又从 100 多名预备队员中选出 8 名正式队员。与此同时，他们根据法国人在征服安那普鲁时的装备特点，改进了他们的登山装备。领队约翰·汉特，经过多方努力，请到了一年前曾为瑞士队担任向导的雪巴族人丹增·诺尔盖和通杜普等人，并吸收丹增·诺尔盖为正式队员。

约翰·汉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登山家，早在二次大战以前的 1935～1938 年，他就多次参加过英国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的登山探险队。他卓越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在英国登山界享有盛名。

汉特决定使用去年瑞士队的路线，使登山队在人力、物力和路线上都得到充分的保证。

在汉特的指挥下，英国登山队在海拔 5490 米高处设置营地，然后，又从这个营地一直到海拔 8000 米的南峡谷，连续设置了 8 个补给品营地。每设立一个营地，汉特都给予队员和搬运工充分的休息时间，以便让大家适应高海拔地区的气候。终于，他们来到了冰塔林立的冰瀑区。汉特等提心吊胆地通过了冰瀑区。过后，他们回想起来仍然后怕，于是，他们把这个冰瀑区命名为“鬼门关”。

直到抵达维司坦克姆冰盆地为止，汉特采用的都是上次瑞士队用过的路线。接下来，汉特根据队员们的意见，决定采用一条新路线，这要比瑞士队攀登时绕更远的路，但较为安全些。

他们在南峡谷搭设了第八座补给营地。这时，全队人员已经疲惫不堪，有的因不适应海拔 8350 米的高度，开始出现头疼、目眩、心动过速等高山病的症状。根据队员们的身体状况，汉特不得已把原定的 6 人突击组减少到 4 人。这 4 个人又被分为两个小组。第一组由科学家波提隆与医生艾文斯组成，第二组则由印度籍的雪巴族队员丹增·诺尔盖和新西兰籍的养蜂专家埃德蒙特·希拉里为成员。

5 月 26 日清晨，波提隆和艾文斯首先出发突击顶峰。他们一直攀登到黄昏时分，终于看到了珠穆朗玛最后的山脊线，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不料这时，他们的氧气却用完了，只好遗憾地折返。

5 月 27 日，连续几天的好天气突然变坏，风雪交加。希拉里与丹增忧心忡忡地望着帐篷外的天地，暗暗祈求老天爷能让风雪停止，使他们的行动不至于中断。

第二天，云层果然散开，天空又有了阳光。丹增与希拉里兴奋异常，赶忙准备装备，立即向峰顶出发。他们先把物资搬运到海拔 8500 米处，把帐篷搭设在山脊斜面的岩棚上。当夜，他们在这里宿营，为了节省氧气，留到第二天行动时用，睡觉的时候尽量不用，所以他们很难入睡。

5 月 29 日，天气晴朗，他们在早上 6 时 30 分就出发了。在前方接近山脊的地方，复杂的地形让积雪掩盖住了，他们不得不时常离开路线在积冰的斜面上攀登。历尽艰险，两人总算渡过了这个难关。在这期间，他们的氧气瓶曾一度失灵，无法操作，让他们担心了好久。

希拉里在事后说：“我们所顾虑的唯一问题就是氧气。担心它究竟能维持多久？能够供应我们上顶吗？下山时，氧气够用吗？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脑海里，使我们惴惴不安。”

离珠穆朗玛峰顶越近，浮雪也越深，行动起来就更加吃力。希拉里由于过度疲劳，行动很困难，他每走一步都要留在雪地上大口地吸氧气。他和丹增·诺尔盖轮流在前面开路，两人之间保持有六七米的距离，你走我停，我走你停，差不多一分钟才能走完一步。

忽然，他们发现在前方约 12 米处，有一座雪梁挡住了去路。雪梁的一侧是令人目眩的绝壁，另一边则是深深的积雪。顿时，丹增·诺尔盖与希拉里感到进退两难。但是，他们不甘心在峰顶即将到达时放弃登顶。

“一定会有一条路的。”丹增说。

“我也这么想。让我先来试一试。”

希拉里说完向前迈了一步，发现在岩壁与积雪间有一条狭窄的裂缝。他试着把脚踏上去，然后，慢慢地把体重也加了上去。这个裂缝状似烟囱，稍不留意，人就有坠落的危险。然而，他们终究还是过去了。

1953 年 5 月 29 日上午 11 时 30 分，走在前面的希拉里再也看不到比他更高的地方了，再往前走，就是北坡的西藏了。

“丹增，”希拉里激动地喊着，“我们到顶了，这里是地球之巅了！”

“好！希拉里！太好啦！”

两位勇敢的登山家热烈地拥抱，相互纵情地拍打，表达他们狂喜的心情。

丹增在冰镐上分别悬挂起联合国、英国、印度和尼泊尔四面旗帜。他高举冰镐，让希拉里给自己拍了照。为了有效地摄取这些极其珍贵的镜头，希拉里不顾严寒，摘掉手套，脱下氧气面罩进行拍摄。

最后，两人在峰顶挖了个雪洞，把两件小物品埋在雪洞里。希拉里埋的东西是汉特领队托他带上的小十字架，丹增埋的则是一包奉献给佛祖的巧克力。

事后，当丹增回忆起他在珠穆朗玛峰顶的感受时，依然是那样的情不自禁。他说：“在世界最高峰的顶上，我向南看到了山下尼泊尔一侧的丹勃齐寺，向北看到了西藏境内的绒布寺，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时看到这山南与山北两座寺庙的人。短短的 15 分钟对我们两个幸运儿来说，实在是太短促了……”

为了节约时间，丹增和希拉里在峰顶只呆了 15 分钟。下午 2 时，他们回到 8500 米处的营地休息。傍晚，他们在下边的一个营地与支援队会合。他们一起向下，到达又一个营地里时，领队汉特从他们疲惫不堪的脸上似乎看到了什么，他以为他们又失败了。当汉特得知珠穆朗玛峰已被征服时，他激动万分，泪流满面，紧紧地拥抱着两位勇士。

出发之前，汉特曾代表英国登山队与泰晤士报订下合同：英队登山的全部报道权均属泰晤士报。因此，在其他舆论媒介还在为英国队能否胜利作种种猜测的时候，泰晤士报捷足先登，在头版的重要位置长篇报道了这个登山史上非凡的胜利。

初登珠穆朗玛峰的胜利，是一个空前的胜利，只是让英国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两位勇士当时都不是英国人。所以，在 1955 年 5 月，英国人又组队攀登海拔 8598 米的干城章嘉峰时，登顶者全是英国人。

在这以后，世界上其他几座海拔 8000 米以上的巨峰，都陆续遇到了强劲的挑战者。在连续十几年中，喜马拉雅群峰上捷报频传：

1954 年，奥地利登山家征服了世界第 8 高峰卓奥友峰（海拔 8153 米）。

1955 年 5 月 15 日，法国登山队登上了海拔 8481 米的世界第 5 高峰——马卡鲁峰。

1956 年 5 月 9 日，日本人成功地征服了海拔 8156 米的世界第 7 高峰——玛纳斯鲁峰。

1956 年 5 月 16 日，瑞士登山队在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同时，征服了珠穆朗玛峰的姊妹峰——海拔 8511 米的世界第 4 高峰——洛子峰，创造了一个队在同一个时期成功攀登两座 8000 米以上高峰的记录。

1956 年 7 月 7 月，奥地利登山队登上海拔 8035 米的加舒尔布鲁木 II 峰，这是世界第 13 高峰。

1958 年 7 月 5 日，美国登山队成功地征服了海拔 8068 米的世界第 11 高峰，它位于喀喇昆仑山上的加舒尔布鲁木 I 峰。

1960 年 5 月 13 日，瑞士登山队首次登上海拔 8172 米的达拉吉利峰。

1964 年 5 月 3 日，10 名中国登山家登上了最后一座 8000 米的巨峰——

希夏邦马峰。

在这个“喜马拉雅黄金时代”里，人们征服了 8000 米以上所有的高峰。在这个时代里，继英国人以后，瑞士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先后登上了地球之巅，人类登高的勇气与能力，在世界第一高峰上，多次得到了显示和验证。

无氧攀登

不使用氧气装备攀登 8000 米以上的高峰，是登山家们攀登喜马拉雅山面临的一项新课题和新难度。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山是人类“死亡带”，或者叫做“生物禁区”，就是说，“在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度上，人类和其他动植物都无法生存”。所以，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这项展示人类最大忍耐力的尝试，还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的。

1973 年 5 月 1 日，由德国、瑞士、奥地利三国联合组成的男女混合登山队，首次实现了人类对 8000 米高峰的无氧攀登，其中有 4 名队员（包括著名德国女登山家哈·施玛兹）在自始至终不使用供氧装置的情况下，成功地登上了海拔 8156 米排名世界第 7 的马纳斯卢峰。

1975 年 10 月 6 日，在登上海拔 8481 米的马卡鲁峰的 7 名南斯拉夫队员中，登山家马尔扬·库那别尔也自始至终不用人工氧气而登顶。

1978 年 5 月 8 日，33 岁的意大利著名登山家蒂茵霍尔特·梅斯纳和 35 岁的奥地利登山家彼得·哈贝勒，更是以惊人的勇气与毅力，坚持自始至终不用氧气装备，经尼泊尔一侧的南麓，完成了对珠穆朗玛峰的征服。3 个月后，梅斯纳又在无氧的情况下，登上了海拔 8125 米的第 9 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同年，美国登山队的 3 名登山家也按事先计划，成功地对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海拔 8611 米）进行了无氧征服。也是在这一年，德国、法国联合登山队的 3 名登山家，又在完全不用人工氧的情况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1980 年 8 月 20 日，梅斯纳以不可思议的勇气、体力和意志，成为人类历史上孤身一人从北坡对珠穆朗玛峰成功地进行无氧征服的第一人。这是世界登山史上的奇迹，是跨越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绝唱。

不屈的中国人

中国，一个多山的大国，它的境内和边境分界线上，有许多世界级的山峰。世界上 14 座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峰中，有 10 座牵连着中国的国土，其中包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

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力衰微，民不聊生，中国人根本无力组织登山运动，最多只能做西方国家登山队的仆人和搬运工。

当年，拿破仑曾预言：中国是一头酣睡的“东方雄狮”，当它站立的时候，全世界都将会为之震憾。这个预言是 100 多年以前下的，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了实现这个预言的可能。

1955 年 8 月 11 日，中国登山家们与前苏联登山家们一起攀上了一座海拔 6773 米高的山峰（团结峰）。6773 米，这是新中国登山家们所创造的第一个属于自己的高度。

1957 年，中国登山家们独立征服了世界著名的贡嘎山主峰（海拔 7590

米），在世界登山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不得不对这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人数众多的民族给予重新的评价。他们预感到：中国这头东方雄狮已经醒来，它必将以自身最大的努力，跻身于世界登山运动的前列。在喜马拉雅山黄金时代的高潮期，各登山强国的著名登山家们都已感到，中国人将对他们在登山运动上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只是，谁也不曾料到，这种挑战竟会来得如此的迅速。

1958 年 3 月，前苏联 100 名功勋登山运动员联名写信给苏中双方，要求两国政府支持两国登山家联合组队，在 1960 年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中国政府和运动员的支持。

在这次行程开始的时候，世界许多山区正流传着关于“雪人”的种种传说，前苏联的几种报纸也都报道过“雪人”的“活动”。中苏双方运动员下撤途中，经常听到雪鸡在峭壁间鸣叫。于是，有的人便与同伴开玩笑说：“当心雪人！”“听啊，雪人在笑！”这时，在海拔 5300 米处的一个营地里发生了一件令人生疑的事：原先为运动员下山时准备的三顶帐篷统统被撕得破烂不堪，里面的食品全都被抛出，箱装的香肠、鱼干、肉干和面包干几乎都被吃了个精光。几桶罐头肉被咬得布满了小孔，上边留有鲜血的痕迹。帐篷周围的雪地上也残留下许多大脚印……队员们呆住了，难道真的有雪人？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闯入营地的强盗是帕米尔棕熊。这些模样呆头呆脑的家伙居然如此聪明，知道跟踪登山队员一路上肯定会有好吃的。

中苏登山家们在共同的训练中，一直合作得很好，他们之间还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58 年 10 月，由许竞和别列斯基率领的中苏登山家们首次进入西藏，对珠穆朗玛峰周围地区进行了侦察。这次活动历经 18 天，行程 300 公里，主要侦察了东绒布冰川和中绒布冰川等路线。

1959 年，按照双方的协议，中国方面如期修建了从日喀则到珠穆朗玛基地营——绒布寺附近 300 多公里长的公路。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前苏联当局不顾本国运动员的意愿，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元帅指示道：中国人自己干，而且一定要干好！也相信一定能干好！

誓死要拿下珠峰的中国登山家们，为登上珠穆朗玛峰而进行的训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1959 年 7 月 7 日，33 名中国登山家集体登上了慕士塔格顶峰，其中包括 8 名女登山家，她们是周玉瑛、王义勤、丛珍、王贵华、西绕、潘多、齐米、查母金。这些杰出的中华女儿，以海拔 7546 米的登山高度，创造了当时世界女子登山的最高纪录。33 名运动员同时登上 7500 米以上的高峰，这在世界登山史上也是第一次，充分显示了中国登山运动的实力。

1960 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个自然灾害年代，是 6.5 亿中国人民普遍陷入饥荒而节衣缩食的年代。就是在这个年代里，中国的登山英雄们却干出了一件让全世界都震惊的事：攀登珠穆朗玛峰，征服地球之巅。

当时，处于财政困难之中的中国政府，专门拨出巨款用于购买攀登珠穆朗玛峰用的登山装备；中国各专业工厂为登山队赶制了羽绒登山服和加厚睡袋。这次登山活动不仅是中国登山家们的奋斗，它已经演变成一场全民族的抗争，一场全中国人与艰难险阻的最富有象征意义的抗争。

1960 年 3 月中旬，中国登山队离开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经日喀则等地，

沿着当地藏族同胞为他们修筑的公路，开向珠穆朗玛峰山麓。这是一支由 20 多辆卡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

3 月 19 日，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干燥的雪粒像浓雾一样弥漫在山峦上空，阵阵刺骨的寒风把沙石卷起几十丈高。中国登山队的全体队员，冒着高原的风雪和严寒，来到了珠穆朗玛的脚下。在他们的头顶，是世界的第一高峰，一座海拔 8848 米的巨型金字塔。它巍然雄踞在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上，峡谷中悬挂着几条大冰川。这里，是雪的故乡，冰的王国。

登山队员们跋涉到海拔 5120 米的高度。他们在著名的绒布寺的上方，找到了一块谷地。这是一道已经萎缩的山谷冰川的脊部。登山队决定，将大本营安扎在这里。

中国登山队在这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登山基地，他们把这个基地称为喜马拉雅新村。这个硕大的喜马拉雅新村，总共有 20 多顶、每顶可供 20 人居住的加厚棉帐篷，有食堂、会议室、发电站、医务室、电台和记者站，还有卡车、越野车、牦牛等运输工具。

在喜马拉雅新村的村口，有一个用松柏和红布扎成的象征性彩门，登山队在两边的门框上贴上了一幅大红对联：“ 英雄气概山河，敢笑珠峰不高。 ”横批是：“ 人定胜天。 ”中国登山家们的万丈豪气，由此可见。然而，珠穆朗玛山区气候瞬息万变，暴风雨常常把帐篷刮得东倒西歪，还有发出雷鸣般轰响的冰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和高不可攀的险峻山峰……这些险阻在二次大战前，曾接连击退过英国人的 8 次进攻。为了打通一条通向“ 北坳 ”的路线，英国人曾付出了 11 人生命的代价。今天，它对待只有不到 5 年登山历史的中国人，难道会客气一点吗？计划制定者认为，征服 8000 米以上的高峰，不能指望一次行军就夺取胜利，而必须经过几次适应性的行军，逐步适应，逐步上升，然后再集中主力突击主峰。因此，他们把征服珠穆朗玛的伟大“ 战争 ”分为 4 个“ 战役 ”：

第一战役，队员们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 6400 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

第二战役，从大本营出发，上升到海拔 7000 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

第三战役，从大本营出发，上升到海拔 8300 米的地方，完成后依旧返回大本营。

这三次适应性的行军，登山队员一方面可以在沿途不同的海拔高度建立起许多个高山营地，为最后夺取主峰创造物质条件。另一方面，逐步地提升高度，使队员们有充分的时间去适应高山环境。

在这以后，第四战役就要求队员从大本营出发，直抵海拔 8500 米的地方，建立夺取主峰的突击营地。然后，从这个突击营地出发登上 8848 米的主峰。

在克服重重困难，登山队员们团结一致完成前两次战役后， 1960 年 4 月 25 日，中国登山队打响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第三战役。4 月 29 日，全体队员重新到达有“ 鬼门关 ”之称的北坳顶部，跨向了新的高度。

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越来越稀薄。队员们在新的高度上变得虚弱起来，活动也更加困难。在攀登海拔 7400 米附近一段直线距离不到 20 米的岩坡时，他们竟不得不休息了 4 次才爬了上去。

经过两天的艰苦行军，登山队的全体队员安全地抵达了海拔 7600 米的地

方。他们在建立了营地进行休整后，在 5 月 2 日晚间，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和藏族队员拉八才仁、米马又组成了侦察组，连夜向海拔 8100 米的高度进发。他们打算先建立起 8000 米以上的第一个营地，迎接后面队员的到来。

严重风化的石灰岩坡岭上，堆积着极易滚动的乱石和岩片，脚踩下去，立刻会陷进乱石缝里拔不出来；如果用力蹬踏，石块就会像冰雹一样滚泻，极易使身体失去平衡。为了取得对高山环境更好的适应能力，4 名登山家尽管背着轻便氧气筒，但都没有使用，他们艰难地喘着气，缓慢地移动着脚步。

天完全黑了，四周朦胧一片，只有远处山峦上的积雪发出微弱的白光。刺骨的寒风不住地撞击着山岩，发出凄厉的啸声。登山家们用冰镐试探着道路，用观看星斗的方式辨别着方向。他们的脚步声在山谷的夜空中发出沉重的震荡，高山靴上的钢钉在岩块上敲击出点点火花。终于，他们在午夜到达了目的地，在海拔 8100 米的地方支起了营帐。

然而，新的困难几乎将他们逼入了绝境，他们的食品已经没有了。连日来，由于运送物资的队伍遭到风雪的阻挡，登山队员们每天只能依靠几口炒面、几块糖果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对于这 4 位开路先锋来说，在他们奋战十几个小时、肚子饿得咕咕叫唤的时候，却连一点吃的也得不到了。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整个计划就会被打乱。

藏族队员拉八才仁和米马站起来请求允许他们返回 7600 米的营地去想办法。这两个藏族小伙子整整奋战了一夜，又毅然顶着-40℃的严寒，走进了苍茫的夜色之中。

在到达 7600 米营地后，极度的疲劳使米马的身体垮了下来，他躺在帐篷里，一下也动弹不了了。但是，运输队仍未上来。王凤桐、石竞和藏族队员贡布连忙把他们携带的总共不足一斤的炒面装好，同拉八才仁一道，在黎明时分赶到了 8100 米营地。

为了进一步确定突击顶峰的路线，第二天上午，史占春、许竞、王凤桐、石竞、拉八才仁和贡布 6 人又开始向更高的高度前进。

在当时的世界航空生理学上，曾把海拔 8000 米以上高度的地区称为死亡地带。据科学界的预测，海拔高度为零的海平面上，空气中氧气分压为 150 毫米水银柱，而到了 8000 米高度，氧气分压只有 46 毫米水银柱。严重的缺氧状况，会造成人体机能的各种不良反应，甚至死亡。因此，在当时的国际登山界，8000 米是一个高度极限，如果不使用氧气瓶，在这样的高度上生存是难以想象的。

史占春等 6 人在很少使用氧气瓶的情况下，心脏跳动得特别猛烈，但他们仍坚持着，他们要亲自试试人体在死亡地带的反应。

他们踏过白雪皑皑的山坡，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山岭侧脊，成功地绕过了珠穆朗玛峰的第一台阶。然后，他们又走上了铺盖有重重叠叠黄色风化石的陡坡。这个陡坡像一根带子围绕在珠穆朗玛顶峰之下，曾让英国探险队吃足了苦头。现在，他们顺利地通过了。

石竞、拉八才仁和贡布三人在海拔 8500 米处停了下来，着手建立中国登山队的最后一个营地——突击营地。

而史占春和王凤桐还不满意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决定继续前进，开始攀登被英国登山家认为是“不可超越”的“第二台阶”。

“第二台阶”是一座陡峭而光滑的岩壁，高度为 30 米，坡度为 70°左右，攀登者在这道岩壁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支撑点。这里是 1924 年著名登山家

玛洛里和欧文失踪的地方，也是阻挡英国登山队从北坡登顶的最后难关。

史占春和王凤桐匍匐在岩壁上，一点一点地向上移动。他们翻过巨大的岩坡，终于在当天晚上 9 时攀登到了海拔 8600 米处的“第二台阶”顶部，这比预定的第三战役计划到达高度高出了整整 300 米。天色漆黑，周围什么也看不见。为了准确地找到突击顶峰的路线，他们要在这里过一夜，等天明后再进行侦察。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决定不用氧气瓶。

史占春和王凤桐用冰镐挖了一个雪洞，两人在雪洞中紧紧挤坐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

这一夜，他们十分沉着地创造了一项在世界登山史上了不起的记录：不用人工氧气在 8600 米高度安全宿营。

转眼已到了 5 月中旬，根据气象预报，1960 年的雨季将在 6 月初到来，如果不抓紧有利时机，中国登山队向珠穆朗玛峰的第一次挑战将因为雨季的来临半途而废。所以，中国登山家们的第四战役是背水一战。在这一年中，他们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

5 月 17 日清晨，绒布冰川河谷上空云雾迷茫，全体登山队员集合在大本营喜马拉雅新村的广场上，参加对突击队的授旗仪式。负责基地营全面领导的韩复东总指挥，亲手把一面代表全中国人民期望的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主席的半身坐像交给突击队员，委托他们把这面旗帜插上地球之巅，从而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从自己的国土上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13 名优秀的登山家在副队长许竞的率领下，激动地举起了右手，庄严地宣誓：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前进，不征服顶峰，誓不收兵！

他们心里很明白这次授旗的分量，也完全懂得形势的要求和全中国人民的殷切期望。

困难是巨大的，前几次行军过程中发生了较多的人员冻伤，各个高山营地上储备的食品和氧气都有不同程度的消耗，尤其是在 8000 米以上的几个营地，食品与氧气都所剩无几。这是一场冒险程度相当大的突击。

突击队员们在锣鼓声、欢呼声中告别了大本营里的战友，踏上征途，向云雾重重的山岭间挺进。为了节约时间，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一天就到达了海拔 6400 米的第三号营地，第二天又登上北坳的冰坡，到达海拔 7007 米的第四号营地。23 日中午，许竞带领着 13 名队员赶到了海拔 8500 米的地方，并在这里把突击营地改建在一块极其难得的雪坡上。

5 月 23 日晚上 10 时，从海拔 6400 米处的第三号营地发出了信号弹，表明“24 日为好天气”。这个消息让突击队员们感到振奋。

5 月 24 日清晨，阳光灿烂，朵朵白云环绕着珠穆朗玛尖锥形的顶峰飘荡。9 时半，突击队员们由突击营地出发。在前几次的行军中，副队长许竞一直担任侦察任务，体力消耗过大，这回他只走出 10 米便倒下了。突击队决定由王富洲率领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承担最后登顶的任务。现在，整个中国登山队还能继续冲刺的，只剩下他们 4 个人了。但是，就他们这 4 个，由于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连续攀登，体力上也有了极大的消耗。

王富洲等 4 人组成的突击组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才上升了 70 米，来到了“第二台阶”下方。在缺乏体力难以发挥技术的情况下，他们一次次地攀登，又一次次地从“第二台阶”那陡峭的石墙上掉下来，5 个小时里，他们经历了十几次的失败。

刘连满又一次自告奋勇充当开路先锋。这位来自哈尔滨的消防队员，总

是不声不响地寻找最艰苦的事情来干。依次跟在他身后的，是昔日的西藏农奴贡布、地质队员王富洲和林业工人屈银华。他们 4 个人咬紧牙关，一点点地接近了“第二台阶”的顶部，5 米，4 米，3 米……然而，就这 3 米，又让他们重重跌下来了 3 次。事态变得严峻起来，中国登山队的巨大努力，全中国人的期望，眼看要因为这 3 米而付诸东流了。

气喘吁吁的刘连满又颤巍巍地蹲了下来，他骤然想起消防队里的一项技术——搭人梯。他要屈银华踩在自己的肩膀上，他要把屈银华托上“第二台阶”。

屈银华看了看自己脚下钢牙铁爪的登山鞋，不忍心往自己伙伴的肩上踩，可是为了中国登山队的最后胜利，他又不得不踩。他冒着-30℃的严寒，不顾被冻掉脚趾的危险，毅然脱掉了登山鞋。他不能踩伤自己的伙伴。

刘连满，咬紧牙关站了起来，他已经好久没有吸氧，24 个小时没进食了。在这样的高度里，任何一个受力的动作都会给身体招来极其难忍的反应。他呼吸急促，眼冒金星，两腿剧烈地打颤。这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这回已决心拼掉这条命了。他使足了全身的劲，支撑着，支撑着……然而，刘连满已经站直了，屈银华却还是够不着顶。于是，刘连满又用双手默默地举起冰镐，满含热泪的屈银华又站在了镐头上。这又是一项奇迹，刘连满在极度疲倦的情况下，在高度缺氧的 8500 米多海拔上，竟然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用自己的双臂，把同伴举上了“第二台阶”。

屈银华上去了，他用那根连接着 4 个人的登山索，把同伴们一个个地拉上了“第二台阶”。然后，4 个人稍事休息。藏族登山家贡布按照本民族的习惯，吃起了风干的生羊肉，但是 3 名汉族登山家却吃不惯，他们的食物只是两块糖和一口雪。

太阳已经偏西，他们却还有 280 多米的高度要攀登。在这最后的路途上，在体力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进行黑夜高山攀登是具有很大危险的。但是，为了在雨季以前的最后一个好天气周期内征服珠穆朗玛峰，他们只有冒险前进。

由于在征服“第二台阶”时，刘连满一连顶起了屈银华等伙伴，体力消耗太大，又得不到食品补充，他的行动越来越迟缓，走不了几步就要坐下来或躺下来休息。这样，在他们终于到达海拔 8600 米时，大家坐下来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

情况很不妙。第一，食物只剩下了几颗水果糖，大家已有 30 多个小时没吃到粮食了；第二，全部的氧气含量只剩下 80 多公升，肯定不够用；第三，刘连满已无法前进，大家的体力消耗也已经过大，再拖下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此，会议果断地决定，刘连满留在原地，把所剩的几块糖和 80 公升氧气全留给他，让他尽快恢复体力，其余的三人，则冒着黑夜的严寒继续前进。

刘连满为了不拖累全组，同意留下，但是，他坚决不同意把食物和氧气全留给他。他说：“我留在原地不动，体力消耗就少，你们比我更需要氧气和糖，快走吧！祖国和人民还在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王富洲泪水纵横，他对刘连满说：“连满，安心休息，等我们回来再一起下山！”他又回头对贡布和屈银华说：“不管情况多么严重，我们只有前进的义务，而绝没有后退的权利，前进！”

他们与刘连满拥抱了以后，转身消失在寒风呼啸的黑夜之中。

雪坡越来越滑，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改道经东北方向的岩石坡向主峰突击。他们翻过两座坡度在 60 ° 以上的岩石坡，又开始攀登一座岩壁。贡布上前开路，不到几分钟就累得浑身颤抖。于是屈银华上前接替贡布，他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前进了两三步，忽然两腿一软，又滑了下来。最后，又换上了王富洲，这才总算开出了前进的路。

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峰顶能看出隐约的轮廓。为了防止意外，3 名登山家都匍匐着前进，凭借雪光辨认前进的道路，终于上升到了海拔 8620 米。

夜深了，远处山下一片漆黑，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珠穆朗玛顶峰的黑影在他们的眼中变得低矮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带着的氧气全部用完了。

王富洲站在岩坡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 我们三人担负着攻克主峰的任务。氧气没有了，继续前进可能有生命危险，可我们能后退吗？ ”

屈银华和贡布异口同声地回答：“ 继续前进！ ”

3 位中国英雄毅然甩掉氧气瓶，开始了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危险历程。

现在，他们每前进一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很长的时间。严重的缺氧，使他们头晕、眼花、气喘、无力，甚至越过一块一米高的岩石，也要花掉半个多小时。他们互相扶持着、鼓励着，顽强地坚持前进。突然，走在最前边的贡布停了下来。

“ 怎么啦，贡布？ ”王富洲问。

“ 到啦！到啦！ ”贡布放声喊了起来，“ 再走，就要从南面下山啦！ ”

“ 哇，到啦！ ”王富洲、屈银华相继赶了上来。

3 名中国勇士在-30℃的气温下，登上了世界最高峰。他们流着激动的热泪展开了五星红旗。

他们在峰顶停留了 15 分钟。贡布从背包里拿出毛泽东主席的半身石膏像，把它和五星红旗一起放到顶峰东北边一块大岩石下，用小石块细心地保护起来。这时，王富洲摸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 中国登山队王富洲等 3 人登上了世界最高峰，1960 年 5 月 25 日凌晨 4 点 30 分。 ”他在写完这几行字之后，由于双手已被冻僵，再加上身体无力，竟无法把这张纸从日记本上撕下来。

贡布帮助把这段留言撕下来，放进一只白色羊毛手套里，然后埋进了用来保护国旗和毛主席像的细石堆里。

他们还在顶峰拣了 9 块石头，准备把它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王富洲等人在天色没亮之前踏上了下山的路，他们心中没有忘记甘作人梯的伙伴刘连满。

在安全下到北坳 7050 米的营地后，屈银华和王富洲都再也无法步行了。经医生检查后，他俩都不得不接受手术。屈银华被切除了全部脚趾和几节手指，王富洲则从此失去了左脚的 5 个趾头和几节手指。

让我们牢牢记住为中国人首次征服珠峰的 3 位英雄的名字：王富洲、屈银华、贡布。

让我们同样牢牢记住另一个名字：刘连满。他虽然未能登上珠峰顶端，但是，他同样以英雄的行为为中国登山队的胜利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颂歌。

探险的征途是没有止境的，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出现新的挑战，也会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在第一次登珠峰成功后，中国政府又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向地球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的冲锋。

1975 年 5 月 26 日，北京时间 14 时 30 分，索南罗布、潘多、罗则、桑珠、大平措、次亿多吉、贡嘎巴桑、侯福生、阿布钦 9 名男女登山家终于登上了那一米见宽、十几米长的珠穆朗玛顶峰。

在极度的喜悦之后，9 位中国登山家们感到极度的疲劳，但是，他们仍然坚强地站立起来，打冰锥，拉绳索，将一座高达 3 米的金属觇标牢牢地树立了起来，然后，又珍重地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拍了电影、照片。他们还打取岩石标本、冰雪样品，测量冰雪的深度，最后，37 岁已是 3 个孩子母亲的女登山家潘多静静地躺在顶峰的冰雪上，用无线电遥测仪向 20 多公里以外的大本营发射心电信号。他们在这被称为“死亡地带”的地球第三极上整整呆了 90 分钟，完成了大量宝贵的科学实验和重要的历史考证。

1975 年中国人二登珠穆朗玛峰的成功，在人类登山史上创下了两项新的世界记录，即女子第一次从北坡登顶成功的记录和在世界最高峰上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中国登山勇士们与测绘人员密切配合，第一次精确地测定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8848 米（以前的记载是 8882 米）。

这座金属觇标是中国人依旧站在世界登山运动前列的历史见证，它的意义与价值远远超出了测绘高度的作用，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它一直发挥着深远的国际影响。

1975 年 9 月，英国登山家赫斯顿和斯科特两人从西南壁登上珠峰后说：“我俩克服极度的疲劳向顶峰走去，抬头一看，春天由中国人竖立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三角架（即觇标）就在前头，我们忍受着一切痛苦，终于走到了它的身旁。三角架是我们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见证。”

以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波兰、南斯拉夫、日本、朝鲜等许多登山家们在登上珠穆朗玛峰顶时，都是先看到这座觇标，然后在觇标旁留影作为登顶成功的证明。

辉煌的时刻

“珠穆朗玛峰，你们能不能从北坡上，而从南坡下？” 1960 年，当时兼任中国国家体委主任的副总理贺龙元帅，曾这样询问刚刚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之巅的中国勇士们。

1985 年，中国登山协会向日本、尼泊尔登山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中、日、尼三国联合组队，把攀登的难度加大一倍以上，实现在珠穆朗玛峰南北两面同时跨越。这一建议得到日本、尼泊尔登山家们的热烈响应。

1987 年 2 月 24 日，《中日尼 1988 珠穆朗玛/萨迦玛塔友好登山议定书》在北京正式签字。

三国的登山家们感到，他们是要实现人类登山 200 年来的一个伟大梦想，他们的使命包括三项主要内容：一是会师，即三国队员在顶峰相逢；二是横跨，指南侧或北侧的队员翻越珠穆朗玛（尼泊尔人称为萨迦玛塔）峰顶，到达另一侧大本营；三是双跨，指两侧队员，分别进入对方大本营。能否进入对方大本营，是横跨、双跨成功的重要标志。

1988 年 3 月 3 日，三国登山队的北侧队率先进入了海拔 5154 米的北侧大本营。3 月 10 日，身穿红、蓝、绿三色醒目服装的中、日、尼三国登山家们在白雪皑皑的珠峰北侧脚下举行了开营仪式。三国的攀登队长宋志义、重广恒夫、塔什藏布在这里同时升起了本国的国旗，由此宣告北侧大本营建营完毕。3 月 16 日，北侧的三国登山家们开始第一次行军，拉开了伟大的世纪双跨的序幕。

1953 年以来，人类曾数十次踏上珠穆朗玛的顶峰，但是，这座世界第一高峰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驯服。1986～1987 年，前来攀登的 20 多支登山队中，除一队成功登顶外，其余的统统遭到了失败。珠穆朗玛这座世界最高峰，依旧保持着它暴虐的特性，所以，这次攀登对每个人来说，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16 日的行军刚一开始，珠穆朗玛峰就以其不同寻常的暴风雪，对人类这次非同凡响的征服进行抵抗：狂风呼啸，不断撕扯着一、二、三号营地的帐篷，三国登山家们一连几天被困在营地里无法活动。19 日，一号营地的 5 顶帐篷被暴风撕成了碎布条；同一日，三号营地的帐篷也被狂风毁坏。

但是，三国登山家没有被风暴吓住。3 月 22 日和 23 日，以中国登山家次仁多吉、加拉、嘎亚、达穷为前驱的三国修路队终于打通了北坳的第一险关——北坳冰墙，赢得了第一个胜利。

4 月 1 日，第二次行军开始了。 4 月 2 日，中、日、尼三方各派出一名主力，向第二险关、海拔 7028～7450 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起挑战。这时，中日双方在具体战术上意见分歧。北侧第一攀登队长重广恒夫没有采纳中方“早行军、早宿营、尽快穿过大风口避开强风区”的建议，结果由小加措、山田升、那旺永旦组成的修路队，只到达海拔 7300 米处便被狂风推了回来。第二天，重广恒夫接受了中方建议。小加措、山田升和那旺永旦在下午 1 时突破了大风口。这回，为打通大风口立下头功的小加措因强冷风而遭受了冻伤。

4 月 7 日～9 日，北侧相继打通了到达海拔 7790 米五号营地和 8300 米六号营地的道路。接着又是更为艰巨的运输。从未参加过登山的中国队身体素质训练教练孙维奇再三要求参加运输队，被批准后，他竟然背着重负突破了大风口，征服了北坳，一直上升到海拔 8300 米的高度。

4 月 11 日，北侧队在顺利完成第二次行军之后，全体人员撤回到大本营。这时，每一个登山家关心的问题是进入顶峰突击者的名单，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亲手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编年史上写下精彩的一笔。

中方主力次仁多吉被委以第一跨越的重任。这位以 6 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完成从海拔 7028～8300 米运输任务的藏族登山家，在掌声中站了起来，他兴奋地挥起拳头。剩下来的问题是，代表中方与次仁多吉同组的支援队员能不能是李致新。经过这两次行军，李致新左脚拇趾已冻伤，如果继续行军，就有坏死的危险，并还会影响到其他的脚趾。

“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脚趾？”

“要登顶！”

“到了 8700 米突击营地后，走不动了怎么办？”

“爬上去！”李致新从牙缝里蹦出这三个字。尔后，他笑了，因为他被正式确定为次仁多吉的支援队员。

接着，曾曙生又确定了中方的第二突击组人员达穷担任跨越任务，罗则为支援。许多队员的眼圈红了，有的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因为他们未能进

入最后的突击队。曾曙生对 4 名入选队员说：“ 那么多的兄弟把机会给了你们，你们是代表大家上去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

3 月 3 日，正当北侧联队开始第二阶段行军，并奋战大风口时，南侧联队还在通往南侧大本营的崇山峻岭间盘旋前进。

4 月 4 日，南侧的人马比原计划晚三天抵达大本营。大本营建立在孔布冰川的舌部，四周雪山上不时的冰崩、雪崩，给孔布冰川带来了恐怖的感觉。中方队员虽经长途跋涉，却无暇休息。翌日，他们便背着物资上行。

孔布冰川冰瀑区坐落于珠穆朗玛峰西山脊与奴布齐山之间。自从人类发现了南侧通向顶峰的通道后，已有 100 多名登山者的幽魂在此游荡。因而，这里也有“ 死亡冰川 ”之称。它宛如老天爷摔在斜坡的一块豆腐，支离破碎、沟壑纵横，而无法预测的冰崩、雪崩更是凶险万分。尼泊尔人将珠穆朗玛峰称为“ 萨迦玛塔 ”，意思是“ 高达天庭的山峰 ”，然而，走在这“ 天庭之路 ”上的登山者，稍不留神，就可能命归黄泉。

南侧的三国联队在孔布冰川架设了 30 多架金属梯,并且还在许多地段拉上保护绳。尽管如此，前进中的险情仍频频发生。

4 月 6 日，加布、王勇峰、拉巴三人在前往 6100 米的一号营地途中遇到冰川塌陷，一时间，方圆 200 米内的地段纷纷塌陷，声势惊人。幸好，他们三人当时不是处于“ 震中 ”地段，总算还有机会逃脱。

4 月 8 日，丹真多吉、仁那等三人在一号营地附近遇上了特大雪崩，他们拼命奔跑。危急关头，丹真多吉急中生智，他在帐篷附近打了个滚，才躲开了巨大冰块的追打。

4 月 11 日，尼泊尔军方队员巴顿在接近一号营地时不慎滑倒，落入一个深达 40 米的冰裂缝，他用手足拼死抵住两边的冰壁，一边拼命吹口哨报警，一边全力摇动路旗求救。幸亏中方南侧攀登队长仁青平措及时相救，巴顿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 5 月 3 日的冰川大塌陷，它差点儿使南侧中方第二突击队的三名队员遭受不幸。当时，加布、杨久晖、拉巴三人正在海拔 5800 米的高度上前进。突然，他们周围的 300 米冰川开始了大塌陷。杨久晖的下身被碎冰埋住，随着冰块横移了 3 米。加布在返身抢救时，脚下的冰面犹如被踩碎的玻璃，“ 啪啪 ”地四散裂开，冰裂缝在一瞬间扩向了四周所有的地方，冰裂声令人心惊胆战。他们能最后脱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大自然面前，人是强大的，也是渺小的，关键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勇气。凭着这样的勇气，登山家们才能闯过生死关，才能建立功绩。

4 月 18 日，北侧联队已经在海拔 8300 米的六号营地储备了 6 瓶氧气、13 根绳子和必需的燃料，结束了第二次行军。此时，南侧队才刚刚建好海拔 7400 米的第三号营地。暴风雨打乱了预定的时间安排，既定计划又要求他们迅速上行。

日方的队员都来自低海拔区，适应缓慢，因而修路和运输任务几乎全部落在了中、尼两国登山家的身上。中方南侧攀登队长仁青平措因吃苦耐劳而享有“ 小愚公 ”的美称。他不顾自己年纪大，血压高，率领小齐米、陈久晖与尼泊尔队员安格 · 普巴、安格锐塔，于 11 日开始从二号营地向上修路，决心在 20 日前打通南坳四号营地。从海拔 6700 米的二号营地到 7900 米的四号营地，大部分路面铺盖着万年冰雪，光滑异常。而这里的坡度平均为 40 °，一不小心登山者就有滑向千丈深渊的危险。据尼泊尔队员介绍，在二号营地

附近的一个大裂缝里，就存有 32 具滑坠者的尸体。为了确保安全，仁青平措等人在许多地段为其他攀登队员拉上安全绳。

4 月 18 日，大风大雪笼罩着珠穆朗玛峰南侧，有两组人马不得不撤回二号营地。而仁青平措等 6 名中尼两国队员却继续奋进，当晚留住三号营地，准备第二天向南坳冲击。然而，风雪越来越强。中方南侧队长强令仁青平措带队撤回二号营地。身材最大的陈久晖右膝内侧严重拉伤，4 月 22 日，仁青平措等再次冲击南坳时，他不得不含泪受命下撤。仁青平措等则在能见度极差的条件下，与风雪搏斗了 30 多个小时，于 23 日傍晚，登上了海拔 7980 米的南坳。听到这个消息后，南侧大本营的人们稍稍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是确定参加最后突击的人员名单。中方的大次仁与仁青平措参加第一突击组，小齐米与边巴扎西为第二突击组的成员。

4 月 30 日，北侧的突击队员开始上行，他们一天一个营地，第一突击组的中、日、尼三国 6 名登山家按计划将于 5 月 4 日进入五号突击营地，5 日突击顶峰。与北侧不同的是，南侧的第二突击组（每国各两人），将直接从南坳突击顶峰。

5 月 3 日，北侧的突击队已抵达 8680 米突击营地，南侧突击队的第一组则到达了三号营地。决战在即，可南侧的第一组却被暴风雪困在了三号营地。情况对南侧队极为不利。如果第一突击组在 5 月 4 日不能赶到五号营地，那就意味着南侧队的登顶突击必须从海拔高度还不到 8000 米的南坳开始进行。由于第二突击组的 6 名队员没能及时到达三号营地，这样，三号营地的三顶小帐篷，可双倍地为突击队员遮风挡雪。

5 月 4 日，风雪依旧。为了确保双跨成功，南侧中方的队长王振华不再顾及日、尼两方队长的犹豫不决，果断命令仁青平措与大次仁强行上升。

大次仁和仁青平措率先抵达南坳，第二组的边巴扎西也随后赶到，他们奉命在南坳等待日、尼队员。半小时后，只有尼方的安格·普巴赶到了南坳。时间不允许他们再等待了，否则天气再变得更坏，大次仁、仁青平措与安格·普巴都无法如期抵达五号突击营地。大次仁、仁青平措和安格·普巴于是冒着狂风前进。半路上，他们发现了扔在雪中的帐篷。安格·普巴断定，五号营地未备帐篷。这样，他们除了从四号营地背来的炉子外，又多背上了一顶帐篷。

经过长达 10 多个小时的奋争，他们终于抵达海拔 8500 米的五号营地。果然，他们除了在营地上找到 7 瓶氧气外，帐篷和炊具都未曾运到。天色已黑，坚冰和劲风使体力消耗过大的三名中尼队员难以应付。他们费力地支撑着身体，平整好地面，搭上帐篷。

与此同时，上到四号营地的 9 名登山家又碰到了氧气短缺问题。原先据运输队说，四号营地准备了 24 瓶氧气，而实际上，这里只有 10 个氧气瓶，而且，有的已被搬运工们所用。南侧首席攀登队长矶野刚太怒火中烧。但事情到了这一步，发怒已无济于事。5 月 5 日晨，除日本跨越队员北村贡背上两瓶氧气直接从南坳突击顶峰外，四号营地的其余 8 名队员不得不中止突击。他们望着无云的碧空失声痛哭，这些在死神面前都不肯退却的勇士，现在却为失去登顶机会而伤心流泪。边巴扎西哭着哀求：“让我们上吧，没有氧气也可以！”但是，考虑到登山队员的安全，边巴扎西的要求被十分明确地拒绝了。

现在，南侧实际上只剩下 1/3 的突击队员，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5 月 4 日下午 3 时，中、日、尼三国总队长在北京联席办公。他们利用无线电台，听取南北两侧的情况汇报后，确定了 5 月 5 日的登顶会师计划，并决定北侧队在北京时间 6 时出发，南侧队在 9 时出发。两侧同心协力，争取会师和跨越的胜利。首席总队长、中国著名的登山家史占春在北京发出振奋人心的呐喊：“ 为了三国人民的重托，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我们的口号是前进！前进！前进！ ”

是夜，南侧大本营灯火通明，三国队长因为无法与山上的突击队员联系上而焦急万分。报话机的功率小，三队都在二号营地设立了中转站。加布、杨久晖等为把北京的命令送给山上而不断地呼叫：“ 大次仁，大次仁，二号呼叫，听见了没有？请回答！ ”呼叫持续了一夜，终于在凌晨时分叫通了仁青平措。

仁青平措等三人在 8 时 25 分提前出发,南侧大本营的人们期待着他们率先登顶。大次仁、仁青平措与安格 · 普巴刚从突击营地出发，就进入了齐腰深的积雪，每前进一步都要消耗极大的体力。

12 时 42 分，北侧中方跨越队员次仁多吉第一个到达顶峰，这是中、日、尼三国双跨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个历史性时刻。次仁多吉在顶峰大吼：“ 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日尼三国友好登山队报告，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 ”他的声音通过北侧大本营的无线电台直达北京，又通过广播与电视传向了全世界。几分钟后，次仁多吉的氧气用光了，可是他还必须在峰顶等待和南侧队员会师。而此时，南侧大本营与突击队的三名登山家大次仁、仁青平措、安格 · 普巴失去了联系……

次仁多吉在顶峰的雪地里等了 30 多分钟以后,报话机里传来了北京总指挥部的声音：

“ 次仁多吉，你有什么问题吗？还能坚持吗？ ”

“ 能！但手脚冷极了！ ”

次仁多吉经受的是-40℃的严寒。

“ 再坚持一下，多活动活动手脚，李致新马上就要登顶，他背着两瓶氧气，你拿去一瓶，至少也要把他用过的半瓶拿去。 ”总指挥部下达了命令。

“ 我什么也不需要！那瓶氧气还是留给大次仁他们用吧！ ”

下午 2 时 12 分，李致新还未登顶，总指挥部只好下达命令：“ 次仁多吉，我们命令你与已经登顶的日本、尼泊尔队员一同跨越！立即跨越！ ”这时，次仁多吉已经在峰顶等待了 88 分钟。

然而次仁多吉没有走。2 时 23 分，李致新登顶了，次仁多吉兴奋地向北京、向大本营报告：“ 李致新登顶了！ ”

人们这才知道，次仁多吉还在顶峰。他为了等待与南侧队员会师，在无氧的情况下，创下了在珠穆朗玛峰顶停留 99 分钟的世界记录！如果他再不走，双手甚至双脚都可能被冻断，那样的话，他就无法跨越珠峰了。

下午 2 时 23 分，是中、日、尼三国登山队的第二个历史性时刻。次仁多吉终于同意与日本登山家山田升、尼泊尔登山家昂 · 拉克巴一同迈出了跨越的第一步。然而，次仁多吉还是坚持不要李致新给他的氧气瓶。

现在，轮到李致新在峰顶等待了。那天，在突击顶峰过程中，他与日本的山本宗彦、尼泊尔的拉克巴等结组出发。走了没多久，他对路线的判断与日本、尼泊尔登山家发生了分歧。三个人中，他的登山资历最浅，所以，尽管他是对的，却无法说服两位异国同伴。这样，他又一次开始了孤独的行军。

结果，他成为支援组的第一个登顶者。这不仅让日、尼两国队员大吃一惊，连中方人员也大感意外。李致新的狠劲，超出了人们的预想。李致新在峰顶等待了 65 分钟，仍不见南侧队员上来，他只好奉命下撤。当晚，他又在救援迷路的日方电视记者中扮演了主角。

珠穆朗玛峰顶，又恢复了宁静。

如果说，当北侧队员率先登顶时，南侧的中方队长王振华在为南侧队员未能及时登顶坐立不安的话，那么，眼下他是为三名队员的性命安危担忧了。

其时，大次仁却正在为找不到主峰而徘徊。等了半个多小时，望着下面 200 多米处的仁青平措与安格·普巴，大次仁坐不住了，他毅然起身向自己判断的主峰方向“插”去。那里有一座高高的陡壁，一条雪梁是必经之地。雪梁既陡又薄，最薄的地方甚至可以用冰镐插穿。一边是一泻千米的陡坡，一边是时时都可能断裂的雪檐，一步不对就将饮恨终身。

下午 3 时 10 分,大次仁看见了正从陡坡上下来的次仁多吉等三名从北侧跨越过来的队员。

“方向是对的！”大次仁不禁兴奋地喊叫起来，他马上加快了脚步。他抵达了陡壁，从次仁多吉的口中，知道冲向顶峰的路线和大概需要的时间，也知道李致新正在等待与他们会师。刻不容缓，大次仁竭尽全力奔向顶峰。

经过长时间的难忍的等待之后，南侧的中方队长王振华终于在下午 3 时 53 分听到了从报话机里传出的三声口哨声，紧接着是难以抑制的哭泣声。这是大次仁同大本营约定的信号，它告诉大本营，他从南侧第一个登上了顶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南坡征服世界最高峰。

珠峰顶上，狂风夹着雪粒向大次仁凶狠地扑打过来。他忍受着极度的寒冷与缺氧，在顶峰等待着会师。在他的心里还牵挂着血压较高的队友仁青平措。大次仁决意等下去，哪怕是因此失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17 分钟以后，尼泊尔方面的南侧跨越队员安格·普巴到达顶峰。但是，安格·普巴抵抗不住顶峰的严寒与缺氧，很快便向北侧跨越了。会师的重任，完全落在大次仁与仁青平措这两名中国队员的身上。

可是，45 岁的仁青平措却迟迟不见。是因高血压倒下了？还是体力不行难以支持？大次仁将自己的背包放在峰顶上，返回原路去找仁青平措。在这海拔 8800 多米，含氧量不足海平面 1/5 的高空，死神可以说是紧随在大次仁的身后。大次仁在距顶峰 100 多米的陡壁上遇到了精疲力竭的仁青平措。他接过他的背包，扔掉了他的氧气瓶，搀着几乎迈不开步的仁青平措，一步步地逼近顶峰。在珠穆朗玛峰的攀登史上，像大次仁那样在顶峰上下两次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北京时间 16 时 43 分，大次仁、仁青平措同十几分钟前登顶的北侧支援队员、日本的山田宗彦，尼泊尔的拉克巴·索拉及以中村时为首的三名日本电视记者，在世界最高处会合了。中、日、尼三国登山队，迎来了最光辉的历史时刻，在这个历史时刻，仁青平措和中村时在顶峰紧紧地握手。

从次仁多吉开始上顶峰创造在世界之巅上的停留记录，到大次仁、仁青平措终于实现和北侧队员的会师，珠穆朗玛峰顶演出了一幕从未有过的壮丽辉煌的历史剧。

南北两侧三国共 12 名队员的登顶、跨越与会师，宣告人们已双向跨过了世界上最高的国境线。

人们钦佩创造如此动人的历史时刻的三国登山英雄，也钦佩把这个历史

时刻呈现在亿万双眼睛面前的英雄——日本电视记者。这些来自日本电视台的记者，不仅亲身参加双跨珠穆朗玛峰的战役，而且还创下了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的电视实况转播的先例。

这次电视实况转播，是一次现代科技成果与人的力量、意志完满结合的示范，它除了应该以浓重的笔墨载入世界登山史册，也应该被载入世界摄影史。

著名的英国登山家乔治·玛洛里在回答为什么要登珠穆朗玛峰的原因时说：“因为，它就在那里。”山，已经告诉过我们一切。当人与山相逢，就会产生奇迹。假如把登山看作是一种征服，那么，与其说是征服了高山，倒不如说是征服了自我。山的雄伟、深邃，曾使得 17 世纪的索修尔激动不已，曾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登山家探索自然的强烈愿望，以至于成为许多勇敢者的唯一的人生追求。无数的人间奇迹就是这样产生的，人本身的怯懦与犹豫也是这样克服的。

两个世纪过去了，现代社会的生活和文明，给人类带来了舒适的享受，但也使人类相对地远离了他们仍赖以存在的大自然。有人担心，这种现状，会使人丢失人类祖先不安于现状的勇气和胆略，变得随遇而安。于是，今天的人们正在重新呼唤大自然，回归大自然。而登山，则是最能体现英雄胆略、开拓精神和自我意志的活动。

未来世界又已经为新的勇敢者搭好了舞台。